

武进文博



武进博物馆
2018/1 总19期



明素缎织金狮子补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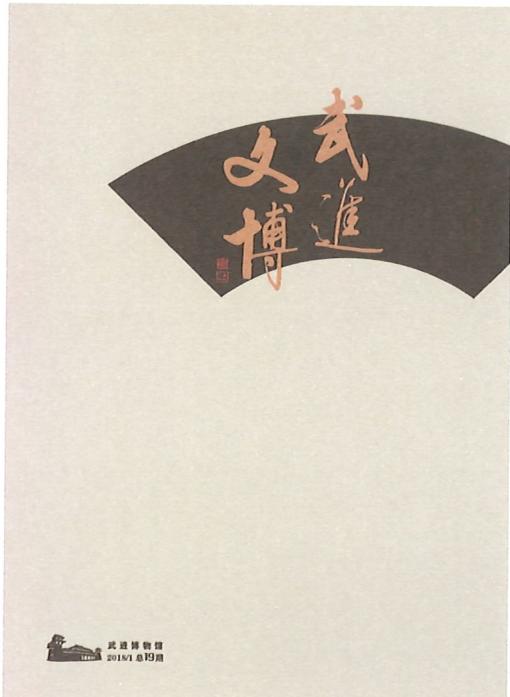


补服面料幅宽58厘米，衣长84厘米，通袖长227.5厘米，袖笼宽54.5厘米，袖口宽13厘米，扎带间隔11.2厘米，叉口长37.5厘米，腰宽63厘米，下摆宽83厘米，补子长37厘米、宽35厘米。

补服面料为棕色素缎。交领，右衽，宽袖。右腋下缀有一副扎带，两侧开有叉口，袖口处缝有宽2厘米的银白色素缎护袖，现一只已脱落。补服前胸和后背各有一幅补子。狮子位于补子正中，作侧身蹲立状，其形作回首瞩目前视，体态雄壮健美；颈部两侧附有腾飞的飘带，脚趾呈出爪状，尾部上扬。狮首周围饰以如意云纹，下部为海水、江牙、山峰，四周杂以灵芝、寿石等纹样。补子图案用捻金钱分别织在两幅面料终端处，成衣时将两幅相拼合缝制，显得金光灿灿和富丽堂皇。

此补服1997年出土于武进横山桥王洛家族墓，出土时保存完整，为二级文物。





2018年第1期

总第19期

顾 问:徐伯元

毛健林

主 编:施建刚

副 主 编:张彩英

编 辑:张彩英

殷洁茹

编 委:王 颖 张彩英 芮路俊

张 宇 金霆蔚 施建刚

唐学军 谭静芬

(排名按姓氏笔划)

地 址:常州市武进区武宜路

春秋淹城旅游区内

网 址:www.wjmuseum.cn

邮 编:213164

电 话:0519-86310589

电子邮箱:czwjmuseum@163.com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 JS-D207

印 刷:常州市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淹城研究

01 姬周嬴秦如此博弈天下

——从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说起

吴洪生

04 淹城源自奄国的一个辅证

朱晓华

藏品鉴赏

05 清宫折扇与扇面

李 理

09 双首三轮转春秋——双兽首三轮青铜盘

施建刚

10 割木为橇筑淹城——独木舟

殷洁茹

地方史研究

11 上店——常州历史人文遗存遗址堆积地

谢达茂

16 明代常州吴氏三兄弟建园记

徐伯元

20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80年前的常州“公花园”前旧景漫谈

张 军

人物考评

23 邵长蘅与《邵青门文集》

杨金达

27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陈伟堂

31 “白璧完操”赵申乔

赵德明

汲古清谈

33 陶湘与《云台二十八将图》

府 军

工作论坛

34 博物馆的“门面”需要精心呵护

——谈谈博物馆展览的日常维保

张 瑶

38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博物馆服务创新策略

许 佳

目录 / Contents

社教风采

- 42 博物馆里幸福年,携手种下“幸福树”——武进博物馆庆元旦活动
43 博物馆里贺新春,红红火火过大年——武进博物馆迎新年活动
44 巧手制作兔子灯,喜迎佳节乐淘淘——武进博物馆元宵节活动
45 拥抱新时代,放飞中国梦——武进博物馆清明节活动
46 百舸争流赛龙舟,传统文化永传承——武进博物馆端午节活动
47 武进博物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49 我们的博物馆日
50 我是小小茶艺师
51 笔尖上的瓦当
52 开卷有“艺”——武博读书月系列活动 王丽娜

展苑集萃

- 53 文房玉·闺阁金——明清江南地区时尚生活展
54 古韵茶香——镇江博物馆馆藏历代茶具精品展
55 至美疆风——杨凡工笔画贺春展
56 八百年不熄的神灯——祭祀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
57 延寿长相思——安康博物馆馆藏秦汉瓦当展
58 春来草自生——中国书法家武进创作培训基地师生作品展
59 先驱文治——民国政要海南石刻遗墨展 金霆蔚

武博纪事

金霆蔚

姬周嬴秦如此博弈天下

——从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说起

吴洪生

最早记载“禅让”其事的是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其中《尧典》说的是“尧舜禅让”，《大禹谟》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除《尚书》之外，提到“尧舜禅让”的还有《论语》和《孟子》等。《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就是综合《尚书》《论语》《孟子》所说而撰述的。禅让，即让善，择善而让，它反映这样一种意愿：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务必要让德才兼备的人管理天下，选择接班人的事要慎之又慎。

对于“禅让”之说，《竹书纪年》这样记载：“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最早提出疑问的是战国末年的荀子：“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同期的韩非，更是颠覆了“禅让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

尧、舜、禹之间“禅让制”之真伪，迄今为止人们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然而，禹的天下被他的儿子启继承了，世袭制由此开始，“天下为公”从此变成“天下为私”，为了“天下”，从此展开残酷的争夺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给“争夺”冠以“革命”的名义。在神权时代，人们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是“天意”，统领天下的最高权力、王朝的大位也是“天命”，由上天决定而永恒不变。然而周文王姬昌推演的《周易·革卦》卦辞曰：“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说革卦卦象是“上兑下离”，泽下有火，水性向下而灭火，火性往上而涸水，水火不容，非革不可。重大变革，经过一个时期，取得民众信赖，得大亨通，获利正道，忧愁消亡。这里周文王从春、夏、秋、冬四时变化的天象中，破天荒提出“革天之命”、转移“天命”的主张，肯定昔日成汤革夏的“革命行动”，只要“民众信赖”就是“顺应天意”，“天命在我”，蕴含着时下（商朝末年）将有一场“大革命”，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也就是按照文王的遗命用武力推翻了商朝。“革命”从此进入人类社会，这样的

“革命运动”，从此就进入“翻烧饼”式的循环往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道德经》），百姓不过是被供着的祭物，地位崇高却没有话语权；“民众信赖”，任谁都会扯起这面旗子。

《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1700多年之后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于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称为清华简《系年》，是近现代以来对古代史书前所未有的发现。《系年》提供的材料填补了先秦史的空白，它记载了诸多周代重大问题，如周代设立“三监”、“共和执政”的确切含义、周平王东迁、秦人的源和流等等。

《系年》约作于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的楚肃王时代，全篇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良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特别是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将对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系年》第1至第4章综述西周史事，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讲到周王室衰落，晋、郑、楚、秦、卫等诸侯国兴起，特别是西周的覆亡、周平王东迁的历程等，许多地方足以补充和纠正传世史籍的记载。第5章开始叙述了春秋战国史事，内容更为详细。

下面是《系年》第3章：

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录子耿。成王屢（践）伐商邑，杀录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危（卫）。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

周武王推翻殷商以后，就在原来的殷都王畿（今河南安

阳)附近,由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设立三监^①,监督那些被镇压而失势的殷商原来的王公贵族。武王刚登上王位,商朝的属国商奄(即商邑)^②,就阴谋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煽动叛乱,武王杀死三监及纣王的儿子武庚而立武庚的儿子禄子耿以延续商氏宗庙。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辅佐成王的周公,再次讨伐挑起叛乱的商奄余孽,杀死武庚的儿子禄子耿^③,忠诚于商朝的叛将飞廉向东逃窜到东夷的商奄古国(即商盖)^④,周公挥师东进,讨伐商奄,杀死飞廉,将商奄遗民向西遣送到郑^⑤,即今甘肃朱圉山一带,也即今甘肃甘谷县西南。安排力量戍边以抵御西北的匈奴及戎族,这就是嬴秦的祖先,世人认为这是埋下了唐朝覆灭的隐患。

以上《系年》所记,可与历代史籍相互佐证。

《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这充分讲明了嬴姓国族在这场战乱中的地位。《史记·秦本纪》讲,奄即运奄氏,属于嬴姓。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和《系年》一样,是说飞廉最后被杀死在东方。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又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閼(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所说秦将(“秦将”与“秦人”不是同一个概念)没有不出自商奄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既然秦将有许多来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

周王室式微,《史记·秦本纪》记秦襄公史事云:“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洛邑,即今洛阳),襄公(即秦仲,因其为庄公次子,故称秦仲)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

之礼。”秦国因此得以逐渐强大起来。

公元前778年,秦庄公去世,秦襄公即位。秦襄公(公元前777年—前766年),在位12年,是春秋时期秦国被正式列为诸侯的第一任国君。当时秦国力弱,狄戎为近患。秦襄公即位初,将其妹缪嬴嫁给戎人丰王为妻,以分化戎人。公元前776年,秦襄公迁都汧邑(今陕西陇县),向东进逼。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镐京,袭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⑥,秦襄公以兵救周。周平王东迁,秦襄公出兵护送,以功封诸侯。东迁后,周平王把王室无力控制的岐山以西的土地赐予秦国,自此秦国开始成为姬周的诸侯国,为日后秦国强大打下基础。

秦国开国君主是商末重臣恶来五世孙秦非子。秦非子(公元前900年—前858年),嬴姓,成为秦国始封君主,号称嬴秦。秦非子是上古部族首领颛顼的后裔。嬴姓是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姚、妫、妘、妊,都为女旁,均为母系氏族)之一,其后商周分封天下时,以国号(地区)为姓,徐氏、莒氏、奄氏等都是嬴姓地。其先祖伯益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而被舜帝赐为嬴姓,故其部族均为嬴姓部族。

大禹末年,曾推举东方颇有威望的偃姓首领皋陶为继承人,以示对传统禅让制的尊重。然而皋陶没有等及禅让,比禹早死。禹又命东夷首领伯益为继承人。禹死后,益(伯益)按照部落联盟的传统,为禹举行丧礼,挂孝、守丧三年。三年的守丧完毕后,益没有得到权位,古本《竹书记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禹的儿子启杀益而夺得君位。之后益率领着东夷联盟讨伐启,长期反夏。经过几年的斗争后,启确立了他在部族联盟中的首领地位,“公天下”从此变成了“家天下”。

夏朝末年,封于东夷地区徐国的伯益次子若木之玄孙费昌弃夏投商,辅助商汤灭夏立商,成为商朝的功臣;伯益长子大廉封于秦,嬴姓,嬴姓部族成为商朝贵族,世代辅佐商朝。商朝末年,嬴姓部族为纣王效力的大廉后裔飞廉与恶来父子,先后被伐纣的武王周公所杀,周公并“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于蒲姑”^⑦。周孝王时,对西周王朝有世仇的恶来的五世孙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分封在秦地(今甘肃天水),

作为周朝的附庸，封地不足五十里。秦人此后世代为周王室养马并戍边对抗西戎，其领地渐次兴盛于陕西关中一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才正式列为东周初期的诸侯。秦始建国。

西周初年武王、周公那次分封，实际上只是一次仪式而已。周公留佐武王两年，武王死后又摄政七年辅佐年幼的成王。期间，周公东征，给商奄为主要力量的反叛势力以沉重打击。根据文献和出土文物证实，“践奄”后周公采取了两项重大行动：一是向西“迁其君子于蒲姑”，由齐国人将他看管起来。二是杀死助纣为虐、后又逃回嬴姓国叛乱的飞廉，并将一部分叛乱的“商奄之民”（商盖之民）中的精英，举家流放到西方邾圉山地区，同时有小部分被逐之江南流亡到现在的武进淹城，后为吴王寿梦所灭。数量巨大的“商奄之民”便留在了“鲁国”土地上，后来赐给鲁国公伯禽（周公长子）监督使用，以至有曲阜近旁“奄里”一说。

周室两次三分“商奄之民”，无疑大大削弱了它整体的力量。殊不知，正是周室分而治之的举措，反而促使西迁的“商奄之民”发愤图强，他们因嬴姓而再度聚合，将东方农耕文化守成特点和西戎游牧马背文化扩张特点进行“杂交”、融合，产生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秦文化，公元前256年（周赧王59年），秦庄襄王灭周，公元前221年，秦襄公30代孙嬴政——秦始皇，最终废黜周室，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秦朝。仿佛2000年（夏（约公元前2200年）——秦（公元前221年））后，姬姓“天下”又回到夏启的反对派嬴姓伯益的后裔、殷商的重臣、西周的叛逆的后人手里；而且以后2000多年的改朝换代，鼓吹“君权神授”，博弈“天下”（此“天下”已由原来宽松的诸侯国“国际空间”蜕变为地理、经济、政治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国家”），国之公器换来换去，一直就轮回在这样的游戏中。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

吴洪生，湟里高中退休教师，副高职称。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注释：

- ①《逸周书·作雒解》《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初，武王大封同姓，其弟鲜封于管（今河南郑州），人称管叔；其弟度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称蔡叔。他们二人加上霍叔为“三监”，负责监管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及商遗民。管、蔡、商（指武庚小商国）均为周室所封。
- ②《竹书记年》载，奄曾三代为商都，这里商邑即是商都，也即商奄。
- ③《尚书·金縢》记载：“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周公首先镇压“三监”，制止了流言，杀了管叔放逐了蔡叔，教育了霍叔；还诛杀了武庚，以纣王庶兄微子继承殷祀，在宋（今河南商丘）建国，史称宋国。《系年》所记与之略有出入，应该是周公平叛中先后杀死了武庚、武庚的儿子禄子耿，最后以纣王庶兄微子继承殷祀。
- ④《中国历史大辞典》：“奄，或称商奄、商盖。古国名。嬴姓。”“商奄，古国名，即‘奄’。”《韩非子·说林上》有“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尔雅·释言》：“奄，覆也。”《广韵·东韵》：“奄，盖之也。”奄（掩）、盖都有覆盖之意，故二字可以互相通假。所以在战国以降的典籍中“商奄”多写作“商盖”。
- ⑤此“邾”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圉”，在冀县南梧中聚。一说“邾”即邾莒，今山东省邹县地方，按方位，“西遭”，非是。
- ⑥申侯侯爵，生卒约公元前771年前后，其女原为周幽王王后，生子宜臼，被立为太子。后被周幽王所废，立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曾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于戏（今陕西临潼东）。前771年，西周覆亡。幽王死后，申侯、缯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迁都到雒邑，是为周平王。东周建立。
- ⑦《史记·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做《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

淹城源自奄国的一个辅证

朱晓华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论述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四《奄和蒲姑的南迁》，约一万九千多字。其中考证淹城，是由鲁地的“奄国被灭”南迁，至延陵（常州）所立，约有四千字。这篇周公东征考，从头至尾，该有多长？可惜无从窥取一阅。

顾颉刚先生从《左传》昭公九年，摘取“到武王战胜商朝，蒲姑、商奄，是我们的东部领土”；从《左传》昭公元年，摘取“周朝有徐国、奄国”；从《左传》定公四年，摘取朝廷分赐给鲁国附属小国礼器、典籍，特别提及“安抚商奄的百姓”。重点介绍奄国，原是两代商王的都城，其地理位置及对于西周的重要性。奄国主动加入武庚叛乱，成为急先锋，惨遭灭国。作为警戒和教训，直至整个春秋时期，数百年未曾离开人们口头的传说。

上述三条《左传》书证，涉及一些氏族名，今天虽弄不清他们的来龙去脉。但仍会引起有心人的联想。武庚反周军事联盟，遭到西周朝廷血腥镇压。由氏族组合的奄国，亡命逃窜，竟还能立足江南，建成三城三河堡垒，名曰“淹君地”。会不会留下氏族抹不掉的痕迹？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经拾起来一研究，果然发现，淹城由奄国胞衣携带而来的原始辅证。

现在的淹城及其周围，分布孟、姜、窦、吴、干五大姓氏，都是不折不扣的古老姓氏。吴姓，源自炎帝姜姓；又说，出自黄帝姬姓，太伯、仲雍为开氏始祖和血缘始祖。窦姓，更古老，出自姒姓，夏帝少康之后。“少康中兴”，他的两个儿子住

在“有仍”外婆家，姓了窦姓。干姓，由扬州的邗姓和山东的寒姓，演变而来。孟姓，出自鲁国姬姓和卫国姬姓。姜姓，源自神农氏，裔孙姜子牙，周初封于齐。研究人员注意到，商奄又称盖奄，以姜姓为主，东夷人的祖先后稷母姜原的姓氏。少皞是远古东夷族首领，以鸟为图腾。奄都，正是少皞故地。将盖奄的“盖”，上下拆开，“皿”上加“子”，为“孟”；“羊”下添“女”，为“姜”。“孟、姜”，便是“盖奄的子女”，表示永不忘母国姓氏。

这不穿凿附会吗？不，不！这恰恰符合人情事理，正好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顺理成章。

追根溯源，孟、姜、窦、吴、干，无不来自中原地带。奄国败亡，犁庭扫穴，灭族巨灾，为生存殊死拼搏，原拥有权力、财富的核心氏族的残部，抱团取暖，倚托淹城求生，负隅作困兽斗，未尝不可能。吃一堑，长一智。构筑淹城，蛇盘龟息，蕴寓水文化意韵、水哲学意趣，是透悟补救之道，寻觅成功之母的智慧产物。顾颉刚先生希望后学，从文字夹缝中搜寻到某些史实。这一辅证，便是一个例子。（参阅魏健、刘禹孜：《奄有四方》。见《淹城早期保护和开发》。）

朱晓华，春秋淹城旅游区《淹城旅游》报编辑部编辑。

清宫折扇与扇面

李 理

在清代宫廷藏品中，有一种方便精巧的手执物件，它既有生活实用价值，又具艺术欣赏价值，这就是清宫旧藏的折扇（亦称成扇、折叠扇、聚头扇）。

折扇与扇面有着不解之缘，两者在形态上可以像幼蛹与蝴蝶一般——互相转换。扇面，是按传统书画形式进行创作的艺术品，作品完成后，可单张装裱成“贴落”，用于室内屏风、隔扇、挂屏等特殊装饰；亦可按书画作品进行装裱，制成多开相连的册页，供人们欣赏与收藏；扇面若是两两相背装裱，下部安以不同材质的扇骨，则可制成方便实用的手持折扇，供人消暑纳凉。而使用过的扇子一旦被拆开分解，将扇页重新装裱或制册——它就又回复到扇面的本来面目。

根据传世文物和相关文献查证，折扇属于舶来品，它是在北宋时期才由朝鲜传入我国（一说在唐朝由日本传入），随后即在中土被争相使用，广泛传播。至明清两朝，无论是作为生活实用品的折扇，还是作为艺术欣赏的扇面，都有大量作品存世，被宫廷贵族乃至平民之家普遍使用或收藏，以至于今天根本无法统计其总体存世数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折扇与扇面，特别是那些名家制作的作品，均已成为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我们今天了解、欣赏古人的巧思和智慧，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证来源。

清宫折扇与扇面，作为古代藏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传世文物的普遍特征，又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对清宫折扇和扇面的欣赏与研究，将为我们打开了解清宫文化与艺术作品的另一扇便捷之门。

清王朝崛起于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其兴之初，满洲贵族即对中原文化十分景仰，开国皇帝利用汉人翻译古代经典，参用明朝礼仪和典章制度，加快了建国步伐，并为以后大规模接受汉文化奠定了基础。

1644年清入关后，随着全国统一政权的建立，以宫廷贵族为中心，开始多方位地吸纳中原文化，同时延用明朝宫廷中的各类器物，使自己更多融入传统汉民族文化之中。

清入关后，自顺治朝开始，各代皇帝从小即在宫中学习儒家经典，广泛学习传统的诗词文章，日日进行书法方面的训练。在功课之余亦会涉及笔墨丹青，包括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乾隆帝弘历，在继位后都曾长期进行书法或绘画创作。后代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帝，也大多勤习书法，常临墨池，为后世留下不少清帝御笔书法作品。

至清朝中期，经过几代皇帝的不懈努力，满族上层贵族已谙熟传统文化内容，在古代诗词歌赋、书画文章方面，许多满族人已不逊于纯粹的汉人。特别是康熙、乾隆诸帝多次率王公大臣南巡江浙地区，日益受到江南文风的陶冶和影响，对历代传世文物及各类文化用品倾心向往，甚至直接拿来使用。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颇具文人气息的折扇和扇面，即开始大量在宫廷中流行。

清宫扇面作品，往往是以书画艺术品进行制作，因此，它与喜好艺术的各代皇帝密不可分。从现有传世藏品看，折扇和扇面有的是由皇帝、王公贝勒直接创作，更多的则为皇帝身边的文臣学士或宫廷书画家创作。

1、玄烨御笔行书诗扇

上弦50.5，股长31厘米。扇子两面均为泥金地，其中一面为康熙帝玄烨御笔行书，写宋人林和靖（林逋）七言律诗18行，诗后题款：“林逋”，诗前引首钤“中和”朱文葫芦印，诗题后钤“康熙”朱文方印，“稽古右文”白文方印。另一面扇右侧设色绘翠竹、梅花，扇左侧为康熙帝御题文征明诗句，引首钤“鸿藻”朱文长方印，诗题后钤“康熙宸翰”朱文方印。

2、金笺乌木股弘历临帖诗扇

上弦50厘米，股长30厘米。扇子一面为洒金笺地，上有乾隆皇帝弘历御笔临王羲之《十七帖》中《汉时讲堂帖》行草书14行，其文为：“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此（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文后署款：“临右军帖，御笔。”文前引首钤“三希堂”白文长方印，款下钤朱文“乾”圆形、“隆”方形连珠印。另一面为泥金地，扇中部设色画桃花树，上栖一只燕子；扇右上侧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腰圆印。

清圣祖康熙皇帝、高宗乾隆皇帝，是大清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也最喜爱书画艺术的君王，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颇有造诣，至今留下数量颇多的书法作品。乾隆皇帝还有不少绘画作品传世，令世人在赞颂其政绩之时，对他的艺术造诣也啧啧称赞。至今，清帝留下的御笔书画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清帝鉴赏、注录的藏品也成为收藏市场瞩目的焦点，故其创作的扇面作品，因数量较少即成为御笔墨宝中的极品。

在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国内其他一些著名博物馆，都收藏有数量丰富的康熙、乾隆皇帝御笔书画作品，其中的扇面作品虽然数量有限，但也足够精美，使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大清天子的儒雅风尚与艺术创作水准。

受到皇帝习书、喜画以及乐于收藏历代名家、名作风气的影响，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成员，有许多人也走上学习、欣赏和艺术创作之路。皇室成员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可以接触到宫内、宫外大量传世书画。他们既可以收藏名家作品，也可以自己进行艺术创作，有些人还通过与当时书画大师频繁交往，涉足到更深层次的艺术研究领域，最终亦成为扬名后世的书画大家，如康熙时期的允禧（多罗慎郡王，康熙帝第二十一子），乾嘉时期的弘旿（固山贝子，康熙帝之孙）、永瑢（质郡王，乾隆帝第六子）、永瑆（成亲王，乾隆帝第十一子）等人，他们不仅跻身于清朝画坛，有众多精美的书画作品传世，也因在清代画史中占有一定地位，而倍受后人的瞩目。

这些宗室书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之时，也会偶尔涉足扇面书画的尝试。至今，他们不仅有相当数量的传统卷、轴、册页形式书画传世，还有一些精美的折扇、扇面作品收藏于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手中，为我们了解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艺术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3、允禧设色山水图扇面

上弦51.5厘米，下弦20厘米。扇面为设色山水绘画。全扇以细致的笔法，绘山峦绵延，江水长天，杂树丛中村居掩映，一叶孤帆横陈江面。扇左侧自题款：“臣允禧恭画”，款下钤“允”、“禧”朱文连珠方印。

4、弘旿设色花卉图扇面

上弦56.5厘米，扇面高18.7厘米。扇面为设色花卉图。全扇以没骨法和勾勒填色法，绘两枝艳丽的花卉，碧叶朱花，紫瓣清雅，枝茎的婉转修长，更增添秋花的妩媚。扇右上部隶书自题：“独坐闲庭看花舞”，后行书署款：“乾隆丙申六月，作于避暑山庄之惬意亭，恕斋旿。”款后侧钤“弘”朱文方印。此扇创作于避暑山庄，应为弘旿的写生之作（按乾隆丙申年，应为乾隆四十一年即公元1776年）。

除以上清朝皇帝、宗室书画家创作的折扇与扇面作品外，在清朝传世的宫廷书画藏品中，其数量最多的，还是那些御前文臣和宫廷书画家的精美作品。

清朝早期和中期，在宫廷中担任要职的文臣书画艺术家相当众多，著名者有蒋廷锡（户部尚书兼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董邦达（礼部尚书）、蒋溥（礼部尚书兼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钱维成（礼部、工部、刑部侍郎，内阁大学士）、高其佩（刑部右侍郎）、董诰（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张宗苍（户部主事）、李世倬（都察院副都御史）、邹一桂（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关槐（礼部侍郎）、钱载（礼部侍郎）以及邹元斗、张鹏翀、沈宗敬、戴衢亨、朱伦瀚、张若霭等人。乾嘉时期，又有盛惇崇、钱楷、缪炳泰、黄钺、戴熙、瑛宝、阮元、姚元之等朝臣书画家名世。

在陪伴天子临朝理政之余，这些身居高位的文臣学士经常在宫内（南书房）或自己的府宅中进行书画创作。他们有时是奉旨而作，有时则是自愿为之，许多人的书画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还颇具艺术研究价值，形成了清宫绘画的独特流派，成为今天许多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珍爱的藏品。

5、清蒋廷锡花鸟图、汪由敦隶书诗折扇

上弦50.5厘米，股长31.5厘米，扇面高18.3厘米。扇子一面为蒋廷锡设色花鸟图，全扇以工细笔法绘扶桑、山茶等花卉，色彩亮丽，枝叶美观；花丛之中挺立一块秀石，其上栖落一只褐色麻雀，扭头注视飞舞的蜜蜂，神态逼真灵动。扇左下侧自题：“臣蒋廷锡恭绘”，款下钤“臣廷锡”白

文，“恭绘”朱文连珠方印。扇另一面为洒金笺地，有乾隆朝文臣汪由敦隶书唐人皇甫曾《早朝日寄所知》等诗句48行，诗后署款：“恭录古诗，臣汪由敦敬书。”款下钤“臣敦”白文，“敬书”朱文连珠方印。该扇外侧扇柄上，各刻有题诗和细致的雕工。

6、关槐青绿山水图折扇

上弦50.5厘米，股长31.5厘米，扇面高18.3厘米。扇子一面为关槐青绿山水图，全扇以大青绿技法，绘山岚层叠，云霭江水，杂树纷呈，桃花艳丽；江滨，水榭相连，江面，二舟轻泛，一派恬然。扇左下侧自题：“臣关槐恭画。”下钤“臣”白文，“槐”朱文连珠方印。扇另一面为洒金笺地，有乾嘉道时期文臣阮元隶书唐人钱起《赠阙下裴舍人》等诗句48行，诗后署款：“恭录唐诗，臣阮元敬书。”款下钤“臣阮元”白文，“敬书”朱文连珠方印。该扇外侧扇柄上，各刻有题诗和细致的雕工。

7、董诰设色花鸟图扇面

上弦51.5厘米，下弦22.5厘米。扇面上部以设色笔法画芙蓉、紫藤花卉，下部画水草、绿藻；扇左部绘有两只飞燕，一上一下，相倚为伴。扇左下侧题款“臣董诰恭绘。”款下钤“臣”、“诰”朱文连珠方印。

8、盛惇崇、程也园、钱楷合绘设色山水竹石图扇面

上弦48.5厘米，扇高15.5厘米。此扇面为宫廷画家盛惇崇、钱楷与友人程也园三人合绘作品。全扇为山水、竹石图，扇中间为盛惇崇作画题诗，左侧为钱楷作画题诗，右侧为程也园作画题诗。按盛惇崇、钱楷等人为乾、嘉时期人，

其署款“癸丑”纪年应为乾隆五十八年，扇面即为1793年所作。

清代中期的宫廷中，喜收藏，重艺术，尤以书画最受皇帝关注，因此，清宫中曾形成专门的绘画机构——紫禁城中的启祥宫和圆明园内的如意馆。它类似于宋朝、明朝时期的画院，有大量专职画工参与其中。

据清人胡敬所著《国朝院画录》等史籍记载，清代康、乾时期，宫中书画兴盛一时，许多以书画见长的文人或献画称旨，或奉诏入宫，专事于如意馆，为皇家创作相关的书画作品。当时，任职宫中的专业画家阵营庞大，可称道者即有四、五十人之多。他们不仅在画史上留有声名，也有不可胜数的绘画作品传世，如焦秉贞、冷枚、王翚、唐岱、陈枚、沈源、王原祁、杨晋、丁观鹏、金昆、孙祜、戴洪、沈映辉、张雨森、余省、金廷标、姚文翰、徐扬、汪承霈、禹之鼎、周鲲、傅雯、方琮、徐璋、张廷彦等。

这些宫廷画家大多为文士出身，有的甚至就是来自江南的书画名流，其艺术创作与绘画风格更近于文人气息。长期任职宫内，精于绘事，创作了一大批工致秀雅的宫廷绘画，而其中即有不少精致的扇面作品。

9、王原祁仿大痴设色山水图扇面

上弦57厘米，下弦25厘米。全幅画秋天景色，山峦层迭，溪水环绕，层林尽染，红叶霜天；岸边置水榭，江中有孤舟。图左上部自题：“仿大痴秋山，庚寅重九日，王原祁。”引首钤“陶情”朱文长方印，署款后侧钤“王原祁”白文方印，“麓台”朱文方印。(按王原祁为顺、康时人推断，庚寅年为康熙四十九年即1710年)，为其晚年作品。

10、徐扬仿唐寅设色山水图扇面

扇上弦49.5厘米，扇高16厘米。扇面上部绘山石壁立，雾霭轻飘，图左侧杂树争秀，飞泉长流。下部大江中一条大船横陈水面，前后有梢公撑船摇橹，船中安坐数位文士，一派逍遥自在。扇右部自题：“己卯长夏，抚唐六如笔，呈恬斋少司马辅国公雅鉴，苏台徐扬。”款下钤“臣”、“扬”朱白文连珠方印。

清宫折扇与扇面，不仅有精彩的书画创作，它的装裱工艺及材料也超凡脱俗。如清宫折扇，其扇骨有象牙、紫檀、红木等雕刻制成，其上不仅有繁复细密的雕工，有的还有雅致的镶嵌纹饰。扇面作品有的采用泥金地，有的采用洒金笺，总体显得奢华而高贵；扇面外部的装裱，则大多采用古香缎等面料，以宫廷挖装形式制成贴落或册页，给人以精妙绝伦的感觉。

总之，清宫折扇和扇面与宫廷书画艺术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反映了清朝宫廷文化与书画艺术的高超水准，为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与文化欣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本文附图见封三)

李理，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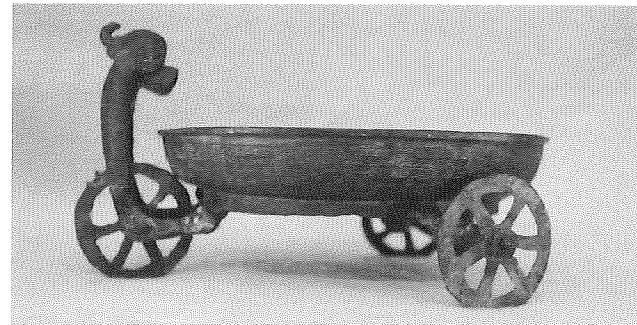
双首三轮转春秋

——双兽首三轮青铜盘

施建刚

1958年，武进县淹城农业社村民在清理淹城河道淤泥时，发现青铜盘、匜、尊等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其中一件双兽首三轮青铜盘造型奇特，极具春秋时期吴文化特色，引起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关注，为研究吴国历史、探讨淹城遗址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双兽首三轮青铜盘通高15.6厘米，盘呈圆形，敞口平沿，弧壁浅腹，圈足。盘口径26厘米，底径14.5厘米。盘底下装有可



转动的三轮，轮前两侧伸出两条长颈回首的双兽，兽首有冠，大目圆睁，吻部前伸，长颈上部饰鳞纹，腰部刻划有双翅纹饰，具有典型的吴国青铜文化的风格。

据《史记·吴泰伯世家》载，商末周人泰伯、仲雍奔吴，“文身断发”，将先进的中原文化融入江南荆蛮土著，始创“勾吴”。周武王克商后，被封为西周诸侯国之一。淹城遗址位于春秋时期吴国腹地，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使淹城出土的盘、匜等青铜器面貌特征具有两重性，既受当时政治、文化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青铜器文化的辐射影响，同时又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文化特色。特别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西周的礼乐制度受到了新时代变革思潮的挑战，原来作为祭祀用品的青铜礼器的性质逐渐发生蜕变，成为贵族世俗享乐的奢侈品。同时受到整个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想影响，青铜器不再囿于礼制约束，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面貌，催生出双兽首三轮盘这样地域风格鲜明的代表性作品。

青铜盘作为青铜礼器之一，是周代贵族们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要进行“沃盥之礼”的盛水器皿。《礼记·内则》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其中的“沃”，即是以青铜匜浇水于手，“盥”则是洗手、洗脸。青铜盘用来承接废水，是“沃盥之礼”的重要器皿，其形制和使用方式都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范式。淹城双兽首三轮盘与一件匜同时出土，说明仍保留有“沃盥之礼”盘、匜共用的礼器作用，但可推动的三轮又似乎表现出不一样的实用功能，与中原地区青铜盘颇异，将实用器与艺术品合为一体，超出了中原文化青铜盘原有范式，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文化韵味，体现吴国青铜艺术特色。

淹城出土的这件双兽首三轮青铜盘，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美学等文物本身价值考量，它所反映出春秋时期吴国在“功用与审美”、“本土与外来”等问题的处理方法，在当代仍富有强大的张力。吴国地处长江下游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走廊上，同时受到南北两方面的文化浸润影响，吴文化就是在两种文化交流、碰撞下而产生的特定区域文化，从而形成了吴文化善于交流吸收并在文化融合中保持自己的特色的优点，同时具有开放性和独立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焕发着勃勃生机。正是这样开放的思维造就了富有生气的双兽首三轮青铜盘，从而产生了中国青铜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施建刚，武进博物馆馆长。

刳木为櫈筑淹城

——独木舟

殷浩茹

独木舟，是用单根树干挖成的、借助桨驱动的小舟。最早出现于石器时代，是我们祖先在原始社会就已广泛使用于渔猎和运输的水上劳动、交通工具。其优点在于由一根树干制成，制作简单，不易漏水或散架。可以说，它是人类最古老的水域交通工具之一。独木舟作为水域交通工具的特点在于一个“独”字，舟身浑然一体。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发现，树叶、树干在水里会漂浮，又发现，树叶能负荷的重量很小，树干能负荷的重量就大，树干越粗大，其所能承受的重量也越大。人们还发现，圆柱形的树干在水里不稳定，它会翻滚，人在上面坐立不稳，人们根本无法在这种圆柱形树干上面活动。于是，人们就用石斧、石锛、锤等工具，将圆圆的树干削平。后来，发现用火比石斧加工木材更为方便。于是人们将树干上不需要挖掉的地方都涂上厚厚的湿泥巴，然后用火烤要挖去的部分。被烤的部分就被烧成一层炭，再用石斧砍凿而成，这就是所谓的“刳木为舟”。

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目前尚未见有实物出土，但晚于原始社会的独木舟，新中国成立以后却多有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为止已经达到二十余只。从出土的独木舟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独木舟的形制大致有三种：一种头尾均成方形，不起翘，接近平底；一种呈头尖尾方形，舟头起翘；一种头尾均呈尖形，两头起翘。根据舟体外形变化来看，第一种应属时代较早的一种，随着行驶经验的积累，人们认识到舟头部尖形比方形省力，且速度快，于是出现了第二种形制，接着进行更进一步的改进，最终形成了第三种形制。在创造了独木舟之后，人们的活动范围就扩大了，能进一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淹城遗址内城河区域先后出土了4条独木舟。其中长11米和4.2米的两条独木舟，分别收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一条收藏于武进区博物馆；还有残存的半条经修复陈列于江苏省前黄中学校史馆。专家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对藏于武进区博物馆的独木舟作材种的分析（经南京林业大学林化所测定为楮木）和年代的测定（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C14测定为距今2800多年）。淹城独木舟于1965年在常州武进淹城内城河北段的泥炭层下发掘出土。长为7.45米、中间宽为0.69米、深为0.36米、底厚0.04米、帮口厚0.024米。号称“天下第一舟”，为国家一级文物，是淹城出土四条独木舟中较大的一件。舟身整体呈尖头敞尾形，系用整段木材挖空制成。外壁木纹依旧，舟舱两边上端各有一排孔眼，内壁焦炭和斧凿加工痕迹清晰可见。

未修复前，该独木舟破损情况极为严重：大约三分之一大小不等的木块与独木舟主体断开，并且脱落部分已经发生翘曲变形。鉴于当时的严峻的形势，由南京博物院专家对其进行抢救性修复。修复完整后该独木舟为淹城这一独特的古代水城历史原貌的完整性，增添了实实在在的可以观赏、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历史遗留实物瑰宝。为我们研究我国的船舶发展史和淹城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古代独木舟的出现，直接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带动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独木舟作为古代舟船制造的雏形，开启了舟船发展的历史和海上航行的历史，是人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物质产品。

殷浩茹，武进博物馆陈列保管部。

上店

——常州历史人文遗存遗址堆积地

谢达茂

上店古街，坐落在常州城南夏城路和鸣新路十字路口东侧，与常州科教城仅一路之隔。千年古渠（青龙河）将其中分南北，古称上店桥南和上店桥北。古街长度虽然不足两百米，但历史底蕴厚重，名家俊贤辈出。这里是春秋时期吴国大将伍子胥的军寨，吴地民众崇祀忠良的朝圣地；唐朝中期，“晋陵见龙”的祥瑞地；常州历史上，第一正规书院的嘉构地；常州清代五学派中“常州画派”“常州词派”“阳湖文派”，这三个学派领袖的发祥地；阳湖精神“事事争当一流，耻为天下第二手”的诞生地，数十进士名宦的孕育地。进入近现代，这里又是民国早期黉宫“务本小学”和“私立武南中学”（后为上店中学）的肇基地，中国文化新闻界的杰出战士恽逸群、抗战航空烈士恽逸安、“八六海战”功勋将军徐寿祺、中国遥感专家恽才兴的桑梓地。

早在公元前514年，吴国宰相伍子胥受吴王阖闾之命，在今武进雪堰与无锡间筑阖闾城之后，又在今上店古渠旁垒筑军事城寨，称为“胥城”。今城基尚在，“胥城遗址”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伍子胥仕吴为相29年功勋卓著，吴地民众不忘其功其德，在胥城的城基上崇建“伍子胥庙”，供奉伍子胥神像，岁岁致祭，千年以来香火不断，今改额“胥城禅祠”。明代才子唐寅（伯虎）游于中吴，曾进伍子胥庙祭拜，作有《题伍子胥庙壁》诗，诗曰：“白马曾骑踏海潮，由来吴地说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愿与将军借宝刀。”伍子胥文韬武略，忠荩可嘉。他被吴王夫差赐死身亡，浮尸闾江（今雪堰与无锡的分界河）之后，吴国民众划舟入闾江，将箬叶包的饭团抛于水中，祈祷河中鱼类不要咬噬伍子胥的尸身。后来，

此习俗为吴地在端午时赛龙舟、裹粽子的民俗。《吴越春秋》记载：赛龙舟“起于勾践，盖悯子胥之忠作。”二百多年以后，楚国（湖南一带）以同样方式纪念投汨罗江而亡的忠臣屈原，后遂沿为全国性的端午习俗。

唐永徽年间元年（650）仲夏，常州晋陵县尉信都等七人下乡公干，出城南行将至胥城北时，突见一青龙在云霄中飞腾。古代“见龙”，视为瑞祥，当时又正值唐高宗登基不久，更为吉兆。常州刺史佐官将见龙事迅速上报朝廷，时任礼部尚书许敬宗撰《晋陵见龙表》呈皇上御览。他在《表》中写道：“伏见常州别驾终文英表称：‘晋陵县尉信都、叔卿等七人，六月十三日，于县城南云雨之际，见有青龙，长数十丈，大八、九围，久之乃没。’……惟皇作极，感而遂通。惟德动天，远无不应。是使四灵嘉瑞，叶千祀之登期……”《晋陵见龙表》载入《全唐文》。上店古渠流经伍子胥庙前，豁然开阔为一偌大水潭。世传云中青龙是从该水潭中跃出，时有高望儒师称：“伍子胥常年束装青色，其庙前水中跃出青龙又刚好在其入水千年之后。此龙，盖伍相爷千年不朽之化身也！”民众视胥城龙潭为圣地，由此将古渠命名为“青龙河”，出龙之潭命名为“青龙潭”，农历六月十三日成为拜庙日，届时各地香客虔诚投奔，进香祷祭。

上店之名，驰誉苏南，由于它为常州历史上第一座正规书院“毗陵城南书院”的嘉构地，毗陵城南书院建于宋淳熙四年（1177），距今已有840多年。此前数十年，常州虽然已经有邑内硕儒周孚先、周恭先兄弟俩所创并分别讲学其间的“城东书屋”和“城西书屋”、由理学大家杨时讲学地的“龟

山书屋”，但都未曾冠以“书院”之名。因此说“毗陵城南书院”是常州正规书院的肇始，它的创建演绎了一部东南大儒传学毗陵，常州长官崇学重教，邑内雅望薪火相传，书院旧地多出英才的辉煌历史。

毗陵城南书院的创建，必须远溯至宋代张浚父子和潭州城南书院。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四川）人。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历任编修、御史、宣抚处置使、知州、尚书右仆射（宰相）等职，为抗金主战派领袖。张浚“身传文武全才，心传圣贤绝学”，宋高宗赞其“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宋孝宗赞叹“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朱熹赞其：“忠贯日月，孝通神明，盛德源于身。”文天祥评价张浚“相国惟忠，名标清史”。岳珂称张浚“忠义勋名，中兴第一”。宋建炎十六年（1146），权倾朝野的秦桧“怙宠固位，惧（张）浚正论”，令台臣弹劾。因“皇为京惑”，张浚被降职为潭州（今长沙）郡守。张浚到潭州后，建宅于城南妙高峰作为合家之居，后被复召入京。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浚以观文殿大学士衔再次出知潭州。

“三圣无多学，千年仅一翁”。张浚不但文才出众，“奥学妙于心通”，而且尤重儒道、理学之播传。他二次权掌潭州后，将原在妙高峰的家宅大规模扩建成书院，内置监院、讲堂、书楼、书房等六斋，又散纳湖、月榭、卷云亭、养蒙轩、丽泽堂等“城南十景”于园，并亲题“潭州城南书院”匾额。规模空前、恢宏典雅的城南书院建成后，其子张栻于乾道元年（1165）开始执掌书院、授徒传学。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他幼承家学，后师从南岳衡山“五峰先生”胡宏，胡宏得此门生甚为欣慰，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栻潜心理学并自成一派，后为一代学宗，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张栻入主潭州城南书院后，制订了详尽规范的教学大纲，贯彻“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力播儒教理学的主旨，坚持“盖欲成就人材”为经国济世所

用的方针，强调“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的观点，采用“学者之于道，其为有序，其进有序”学思并进的教学方式，推行“盖致知以行其道，而行精其知”学为所用修文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一时间，潭州城南书院声名鹊起，求学者三千余众，成为了称誉一方的名书院。乾道三年（1167），中国理学巨擘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赴潭州访晤张栻，两位理学大师相见恨晚，彻夜长谈，切磋交流学识心得，十分投缘融洽。本意小访即别的朱熹竟然不愿离去，二人为普传理学于天下，决定联手在城南书院设坛会讲。朱、张轮番主讲长达两个多月，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学者之众，堪为中国古代学术交流史上的创举。潭州城南书院以张浚、张栻、朱熹而驰名天下，其后各朝几经修缮，始终为一方人文蔚起之地，与岳麓书院（张栻曾被聘为岳麓书院主事三年）一起，成为“湖湘学派”的代名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潭州城南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称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次年改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南第一师范。曾国藩、左宗棠、黄兴等清末历史名人在此修藏研读，谭延闿、徐特立、杨昌济、谢觉哉等近代名师在此执教，中共一大到会十三名代表中的毛泽东、何叔衡、李达、陈公博、陈潭秋、王尽美、包惠僧，曾先后在此任教或研学。由此，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被称为“千年学府、百年师范”“名人摇篮”，为培养经国济世之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宋代毗陵（今常武地区）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广济，壤土膏腴，经济富庶。在人文方面更是英贤辈出，魁星杰奇。宋大观三年（1109），天下贡士会试汴京，毗陵一地举进士者达五十三名之多，一时名震海内外。宋徽宗特赐《大观学校推恩诏》：“学校兴崇人才，乐育法备令具。劝惩已行，深虑有司失实，尚有遗才使不云乎？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阅前日宾兴之数，较其试中多寡，唯常州为众……。”毗陵

读书风尚之炽，正如“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之孙苏籀诗赞：“延陵乃有能诗鉴，子路尤为少读书。习气未忘翻简册，白头稽古不应愚。”南宋著名学者、大诗人陆游曾撰文说：“……毗陵多先生长老，以善俗进后学为职，儒风蔚然为东南冠。”

毗陵之所以人文之盛不绝如缕，首先得益于邑内读书明经、向学之风炽烈的催生，而历朝郡守、县令重教育，兴学校之德举，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导航引领作用。北宋时，毗陵的州学、县学、书屋阶梯式教育体系已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赢得了“办学圣地”之美誉。江西抚州王安国是曾任常州知州王安石之弟，他赞扬毗陵的州学为“东南绝伟之观”。为了使郡内教育长盛不衰并提升整体水平，地方长官和郡内高望还遍邀宗师硕儒到毗陵讲学课徒。“程门四弟子”之一、著名理学家、闽学开山祖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福建将乐人。曾受邀在毗陵城西书屋（元初易名为“龟山书院”）讲学，并育毗陵弟子多人。后杨时被立为客寓毗陵的先贤，享祀于郡城。宋乾道七年（1171），时任毗陵郡守晁子健，（嵩山人，字强伯。）尤重邑内文事，邀请讲师的标准极高，非全国文坛公认的大师不请。由此，时为“东南三贤”之一、并与毗陵有着历史渊源的张栻成为他的力邀之师。此期的张栻通过执掌潭州城南书院四年和受邀担任岳麓书院主讲三年，已经名声大震为一代鸿儒。张栻与已经成为武进望族的张彦直一族同祖共宗。张彦直的三子张守为宋高宗参知政事（宰相），与张栻之父张浚同为抗金主战派领袖，合力对垒主和派秦桧。同族之缘，父辈之谊，使张栻早有到毗陵访族亲之意。他接到晁子健邀请后，欣然应诺，立即从衡山启程来到毗陵，开始他的讲学访亲之旅。

张栻到毗陵后，晁守恭敬相待如圣，曾多次召集郡内雅望作陪，在郡斋设宴款待于他。张栻在毗陵开课时，由于其族亲聚集城南的缘故，他把讲学所设在张守一族聚居地的城南前坟荡（今鸣凰小庙）以东的上店和殷薛之间（今名“书院里”）。不几日，“当代大儒讲学毗陵城南”的消息传遍江左，平江（今苏州）、荆溪（今宜兴）、润州（今镇江）等地的士

子蜂涌而至，以亲睹席闻名博学风采为幸事。据传，当年上店，穿街古驿车马塞道、青龙河内舟楫阻航。此状况从仲夏延续到深秋，累三月直至张栻课毕。这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播布，是理学在太湖流域承先启后的里程碑，为日后城南书院的创建奠定了舆论基础。

宋淳熙四年（1177），著名诗人、思想家、“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江西吉安杨万里接任常州知州。他十分崇拜张栻才能，赞其为“名世之学，王佐之才”，亲自巡察六年前张栻在毗陵城南的讲学所，后与郡内高望商议，在张栻讲学原址修建书院，并入京请已担任吏部侍郎的张栻题额。张栻思之，父亲所创为“潭州城南书院”，自己讲学常州也恰在城南，于是命名为“毗陵城南书院”，并由为张栻同僚的状元张紫薇书额。《毗陵张氏宗谱》（城南书院藏版）载：“城南书院四字，张紫薇得意之笔，为南轩（张栻）题额，其墨迹尚存。”由此，毗陵城南书院成为常武地区历史上第一所名副其实的正规书院，郡内外学子纷纷慕名前来访师求学。《武进阳湖合志》载：“城南书院，在永胜东乡殷薛（与上店为同一地）。宋乾道末，张栻过毗陵，讲学于此。淳熙间，郡守杨万里私淑其教，即其地建为城南书院，为士人讲诵之所。”

“乔木森森殷薛张，西川一脉衍书香。衣冠济美昇西卞，节孝流芳夹山王。何墅何家贤子弟，陆庄陆宅旧门墙。前湟闻说丁陈古，并有西来翹楚杨。”这首《留题毗陵城南书院》诗，是明成化年间浙江淳安著名学者、曾任吏部尚书的商辂到毗陵城南书院访贤时所作，诗后有注“先生发解后，尝下帷书院中，城南士子多从之游，皆一时之隽也！及别，留题书院。”该诗铺陈了明中期城南书院周边张、卞、王、何、陆、陈、杨常州诸望族占籍状况。同时佐证了城南书院在元至元十六年（1279）遭北蛮兵毁，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重建后教事的繁兴。基于张栻的崇高声望和书院特定的历史内涵，在其后的历史时段内，它对毗陵文脉的传承、理学的弥盛，尤其是对士人风骨的熔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浸润作用。

商辂《题城南书院》诗首句中的“殷薛张”，是孕育“常州

词派”“阳湖文派”领袖之基脉。宋宝佑四年(1256),张栻玄孙张镗(字政一)举文天祥榜进士,授职朝奉郎。咸淳年间(1265—1274)因世乱挂冠。他携家口离京后没有返回祖籍地,而是追踏上祖张栻讲学足迹,来到毗陵城南书院,在书院旁的上店桥南侧殷薛里定居,成为张栻支迁居常州的一始祖。张镗对上祖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曾作《城南书院八景诗》,分别为《龙潭积潦》《雁荡清流》《南轩乔木》《北牖修篁》《荷浜钓舫》《杨浦书楼》《松陵月色》和《竹径溪声》诗中分别记述了张栻“书院题额”、“泊舟钓舫”、“藏书楼下”的佚事,以及风吹书院修竹“和我读书声”的回忆。今“书院八景”旧址尚依稀可辨。在张镗被复召掌军事,与父辈张烈良双双殉宋室于疆场。张镗殉职后被朝廷列为忠烈名宦,后“南轩祠”增祀其位。其后裔继承衣钵遗志,在上店殷薛里掌书院、守祠祀。

到明朝时,常州知府莫愚对城南书院进行了修葺扩建,书院旁又恭筑“南轩祠”,以表彰张栻为毗陵文化教育作出的贡献。经数代繁衍发达,张镗后裔分徙县内各地,清乾嘉时有祖籍上店殷薛里张惠言、张琦兄弟二人,他们矢志传承城南书院的人文精神,竖起了被后世学术界定义为“阳湖文派”和“常州词派”两面引领潮流的大旗。张惠言倡导“以学济文”的理念,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博其学、极其思,他和成员们的学术理论与成果,使阳湖文派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与此同时,张惠言和张琦正本清源,精心编写的《词选》上比《风》《骚》,所出词论既开途径,又标宗旨,一举奠定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更由于张氏兄弟倡导有方,使常州词派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流派。张惠言对词学的开拓弘发之功无人可与比肩,被尊为清代“词学之宗”。清代常州诸学派拓开并形成了独具异彩的常州学风,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先声,梁启超评述清代常州是“一代学术转捩之枢”。

“书院紫薇映金榜,石桥清流誉朝堂。桥南旌扬世恩功,桥北频传报锣响。”该诗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城南书院旁另一

望族——上店恽氏在书院文化的浸润熏陶下,及第者相继,仕宦者踵接的盛况。以明代清臣恽金领衔的恽氏(含北恽)在明清间举进士者多达18名,“桥北频传报锣响”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科举奇迹。最值得称道的是“龙潭”碧池(在城南书院和恽氏故居旁)、“瓯香”逸品,孕育出了有“诗、书、画”三绝之誉、“毗陵画派”创始人恽格。恽格(1633—1690)字寿平,号南田。其世居上店桥南,与城南书院近在咫尺,“伸手可摘院内杏,耳边常伴书声琅”。 “清溪翠堤”、“松陵竹径”、“隔岸雁塘”、“莲沼游鱼”等书院八景,春兰、秋菊、夏荷、冬梅四季花卉,无不是为恽南田早年“没骨”写生而天赐。提笔可点的灵动雅趣,泼墨可染的丽景秀色,伴随和造就了这位蜚声海内外、清代画坛“六大家”之一的书画圣师。他技传百众,师惠难计,连当代刘海粟、马万里等大师也无不得其遗韵。

如果说张栻城南讲学乃开常州人文蔚起先声的话,那么,恽南田开创的“毗陵画派”、张惠言和张琦领军的“常州词派”、张惠言和恽敬领军的“阳湖文派”,则是城南书院文化底蕴彰显最耀目的旷世伟勋。不仅如此,上店的先贤们还喊出震聋发聩的划时代口号。清康熙年间,恽南田让山水画与王石谷,自己转工花卉时出句“耻为天下第二手”;清嘉庆年间,阳湖文派领袖张惠言和恽敬在互相勉励时出句“事事争一流”,这对武进、阳湖乃至苏南诸县的学术才俊,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今人遂将恽南田句和张惠言、恽敬句合璧,组成新时代以创业、创新(双创)敢为天下先为主旨的,体现和反映常州人思想理念和追求的,“事事争当第一流,耻为天下第二手”这一完整的“阳湖精神”。

进入近现代,上店英才继出。1905年1月24日,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常州历史上又一位时代骄子、社会精英恽逸群,在上店桥北诞生了。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在他的身上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忧国忧民的优秀传统,更凸现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爱国爱民、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他被历史定格为中国文化、新

闻界的杰出战士。1914年出生于上店桥南的恽逸安，抗日战争初期致函堂兄恽逸群：“此次战争，是我们民族生死之所系，历史绝续之所关，吾人唯有激发忠勇，共同奋斗，与倭拼战到底，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我们每个人都预备着我们的飞机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抱着“与其亡国偷生，何如光荣战死！与其偷生不得，何如一死报国”之决心，驾战机在空中与日机搏斗而壮烈牺牲，英名镌刻于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1936年出生于上店桥北的海军少将徐寿祺，1965年任“海上先锋艇”指导员，在“八六”海战中立下赫赫战功。1935年出生于上店桥北的中国著名遥感专家恽才兴，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八五”科技攻关等重点项目多项。恽逸群、恽逸安兄弟俩和徐寿祺、恽才兴，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段，为上店古街注入了救国救民的红色基因，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壮士断腕的牺牲精神，发奋图强的创新理念。

千年古街上店，历史遗存堆积。在以上店桥为中心半径500米范围内，集聚了被常州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胥城遗址”、“恽南田墓”，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复建于明弘治年间的上店石拱桥。除此之外还有上店古街“九大厅”“六边厢”“三牌楼”遗址、“城南书院”遗址、“南轩祠”遗址、明嘉靖年间创建的“恽氏宗祠”遗址、上店精英科举累第的“世科坊”遗址、恽逸群捐家产资助创办的“私立武南中学”（后为上店中学）遗址、以及恽南田、恽逸群、恽逸安、徐寿祺等故居遗址。上店，钟灵毓秀，堪称常州城南第一文亨地！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人文传承，又出新篇。以胥城遗址为中心基点，常州市政府规划、武进高新区推进实施的“双创园”目前已进入设计阶段。优秀历史文化能为现代化建设注入灵魂，现代化建设又能为历史文化带来活力。文化是魂，历史是根，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着力于传承历史人文与现代化建设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并融合到双创建设中去，必定会是双赢的结果。常州是创业的热土，创新的标杆，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经验。可以理解为“常州科教城”

向东延伸部分，集聚常州创业、创新机构的“双创园”，是全国首批，江苏唯一的双创区域示范基地。将在设计理念上以习近平总书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的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将历史人文的传承、历史遗存的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共常州市委书记汪泉，近期就常州市政协2018年“深度开发历史名人资源，放大常州历史名人效应”的重点调研课题，作出了“加快建设一批名人文化载体”的批示。就“双创园”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历史名人资源开发，常州市规划局召开了专家论证会。目前已通过专家论证的规划，将在完整保存文物保护单位的“胥城遗址”、“恽南田墓”、“上店古桥”的前提下，拓浚青龙河并扩大水域面积为人工湖，湖边构筑“胥堤”为融入现代元素的人文景观带；规模性复建城南书院为常州书院文化、常州清代学派文化、常州进士文化的室内分区展览场所；复建上店古街和恽南田等名人故居，作为大学城学生和常州人民穿越时空走进古代常州，了解常州古代及近现代名人和他们精神风貌的城南窗口……

可以展望，即将投建的“双创园”必定成为彰显常州历史人文底蕴的耀世嘉构，凸现优秀文化传承、历史名人风采展示和“双创”基地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上店——这一历史遗存遗址堆积地，将会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值得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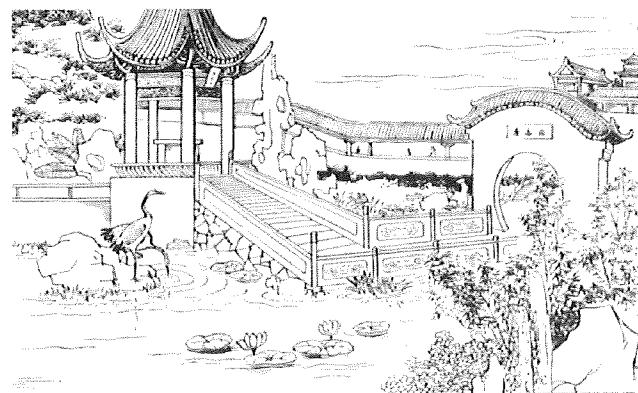
谢达茂，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州市武进延陵季子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明代常州吴氏三兄弟建园记

徐伯元

明清时期，常州私家园林建造达鼎盛期。明代万历年间，常州吴氏三兄弟竞相建园，分别称“青山庄”、“蒹葭庄”和“罗浮园”，园林各具特色，尤以青山庄规模恢宏，园中套园、层峦叠翠、亭榭楼阁、曲径回廊，形胜江浙诸家花园。然而，沧海桑田，园囿易主，吴家花园逐渐衰败，至今难觅原貌或踪迹，翻阅方志或名人留下的诗文，才能窥探它们昔日之辉煌矣！

明清时期，中国私家造园进入登峰造极的黄金时期，而地处江南水乡的常州，私家宅第园林建造也进入全盛期。据常州地方志及各种史籍记载，曾先后出现过诸如汤和的“花园”、陈洽的“柏花楼”、卞氏的“李园”、白昂的“归乐园”、钱孝的“西青草堂”、唐荆川的“陈渡草堂”、吴亮的“上园”、杨廷鉴的“东皋园”等等私家宅第园林，有园名的私家园林就多达数十处。其中不乏同一家族中同期各建私园的例子，如万历年间吴襄、吴充、吴奕仁兄弟就曾分别建有“青山庄”、“蒹葭庄”、“罗浮园”等，成为常州园林史上的特例。



青山庄 娄家骐绘

青山庄

青山庄，是明代常州最为壮观的园林之一，地处常州城北青山门外五里之遥的封嘴桥侧，原三井乡高田村一带，具体遗址地域在今通江大道与锦绣路交汇处东侧(大约在1982年建成的“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后简称为“常州工学院”，现改为“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龙城大道分校”范围及周围)，占地一百四十余亩，规模宏大，曾被誉为“江南大观园”。

青山庄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庄主为吴襄，常州文坛名士。其父吴宽系明代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状元，吴襄是其长子。此园林初建时规模不过数十亩大小。至清初时易主，被徐姓人士购得，后传三世。至康熙五十年(1711)又易主，为学士张玉书之子张愚亭购得，经扩建，规模倍增，重修楼宇增建亭榭，终成城北名胜。常州阳湖文派主要人物之一、清雍正元年癸卯(1723)恩科进士邑人蒋汾功曾有记曰：

出北门，水行十里而近，陆行五里而遥，有隩区焉，曰：青山庄。前明吴氏所建也。入门榜曰：三山在望。旁有三峰，故以此锡名云。国初鬻于徐氏，传三世渐以颓废。康熙辛卯(1711)学士，天门张公自润州(今镇江)来徙居，因以自号，学者遂称青山先生。先生日课诸孙及群从子侄于其中。又以其暇增胜概，曰“松岗”、曰“桃园”、曰“灌畦轩”、曰“修竹吾庐”，皆先生手植存焉。园旧有楼，曰“卧雪其巅”、曰“群玉山头”。可以远眺望，而一园之胜在指顾间矣。堂曰“飞翠”，为饮食宴乐之所，其右曰“乐是轩”，仲子方伯适因以自号，而学者亦称“乐是先生”。益增旧业，辟土宇，列闲馆。池有鱼，亭有鹤，名花嘉卉，娱心悦目，暇胜者益，于是焉趋之。尝思天地万物，皆与吾身精爽相为感召，是故俯仰之在世也，取诸其怀，应求之在我也，从乎其类。室之见美也，惟人日居焉；园之成趣也，惟人日涉焉。其他林泉之胜，草木之繁，鸟

兽虫鱼之泳游啄息，日与人相习，则各效其灵，弃置弗问，则黯然残敝。皆理有固然，如响斯应，又况考德问业，求诸吾身以内者乎？先生之子曰“冕”，好学有文，世宿其业，慨然于聚散靡常，而敬业乐群之不假易也。以乾隆庚申（1740）秋，发书四驰，大合四方诸同学，无有远迩，少长偕来，期九月九日后三日毕集于庄内，四方君子亦皆如期而至，有不远千里者，听夕寝兴往复于其中。张乐设宴，永夜不倦，分题校艺，多寡迟速，一听人自为。讲习观摩之益，丝竹管弦之盛，视昔人有加焉。柳子厚有言：兰亭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夫古今名胜，地以人传，而其地亦遂终古，为共所有。自此以往，世有言山庄者，吾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

张愚亭自号青山，故园名青山庄。园内景点，自园门“三山在望”起，有：水镜轩、归云岫、新月廊、碧涵池、藤花径、飞翠堂、留春亭、水香庵、碧溪闲钓、静香亭、修竹吾庐、卧香楼、天放居、餐霞阁、饮虹桥、桃园、智光塔、七星桥、松荫堂……至烟雨横塘止，共四十二景。成就山水入画，园中套园，层峦叠翠，楼堂隐现，华廊穿街，名木拥绿，曲径回环，峰石怪拙，形胜江浙诸家花园之壮观。

然而，如此美好壮观的园林，竟被张愚亭之子张适糟蹋殆尽。富二代的张适挥霍无度，为维持其花天酒地的奢侈糜烂生活，横行乡里，残酷剥削，高利盘剥，民愤极大。乾隆十三年（1748），众人告发于官府，张适被严厉治罪，青山庄亦被查抄没收充公，名园就此逐渐毁废。

著名诗人袁牧（1716—1797）曾作《青山庄》诗叹云：

笙歌声断水云寒，草草亡家瞑目难。
我与主人曾有旧，青山不忍上楼看。

清代常州先贤赵翼、孙星衍、洪亮吉、赵怀玉等都对名园兴亡感慨万千，先后为青山庄留下了许多诗文名篇。

赵翼（1727—1814）曾以近千言的七言排律诗《青山庄歌》^①记述老园丁诉说青山庄兴衰概况和他本人所见青山庄衰败景象。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一甲第二榜眼洪亮吉，也作《山庄访古图记》存世。

赵怀玉（1747—1823）有《过青山庄有感》^②云：

荒墅遗前代，寻幽独款扉。
断垣遮柏影，老屋上苔衣。
花自迎风笑，鸠还带雨飞。
所嗟频易主，归迹已全非。

孙星衍（1753—1818）作诗《题青山庄仿古人居》云：

眼看华屋变平畴，席帽僧衣落拓游。
交密总思贫日好，情多常替古人愁。
黄栌寂寞稀同辈，白发凄凉过故邱。
一度披图一惆怅，青山门外即西州。

他们都对园主的遭遇和江南名园的衰败发出了无奈的叹喟。

时至清末，青山庄已经成为周围农民集聚的杂居之地，太平天国时，此地取名“西城头村”，其时青山庄内的著名景点“碧涵池”因塘地面积颇大，农民们就在池中塘边种植红菱、栽荸荠、莳茭白等水产食品，塘地慢慢演变成远近闻名的“红菱塘”^③。出产的红菱、青菱壳薄肉嫩，果大香甜，且无尖刺，既可生吃，也可做菜，堪称上品。菱秧外销丹阳、镇江，远达安徽等地。这也算是青山庄最后留下的值得现代常州人回味的一段佳话吧。



蒹葭庄遗址远眺



二十世纪70年代白荡湖

蒹葭庄

蒹葭庄，又名“茶山草堂”，位于常州西南距广化桥约三四里的兰陵路（原茶山路后改武宜路）西侧江南春宾馆一带，白荡河东南侧。蒹葭即初生和尚未出穗的芦苇。白荡河旧称“白荡湖”（俗称“白荡”），由低洼湿沮之地积水而成，湖面开阔浩荡，志书载其面积“泱泱白荡数百顷”（三千余亩）。

蒹葭庄系吴宽次子吴襄胞弟吴充所建。蒹葭庄临湖而筑，此庄有多大，无确切数据，据有关记载：“割白荡之半入园”，可见其恢宏广阔。园内湖面灵朗，引借东南茶山阜丘入画，连绵隆伏，虽非崇岗峻岭，却也颇具山影湖光之胜，恰似西湖一隅。园主有《茶山草堂记》，略曰：

江以南多佳山水，即吾郡亦处处有之，阳羡更为山薮，且产茶。锡山则兼有泉，以供好事者斗茶。吾邑皆平行莽畷之野，独郭外西南隅十数里，有茶山，亦魁，爻邱且。考之邑乘，唐时修茶贡于此（注：即贡茶经此道），故名，杜牧有“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之句。土脉从阳羡来，蜿蜒如游龙，时起时伏，又如覆铛，如累棋，如连珠，如螺如髻，虽无崇岗峻岭，而以负郭得之。倘有幽人韵士，如甫里先生辈，点缀其

中也，岂不以人胜哉？余少时好游，每至此，必藉草坐，便有卜居之想。万历壬子岁（注：1612），始买山而营菟裘焉。山下有白荡，几数百顷，水清冽，藻荇交横，味与常异。余因堤以蓄之，沟以环之，基延广足，当居址之半。雨后，山漏淙淙注之，悉受其不胜也。乃从石窟中放而之荡，且设版焉，以观其建瓴瀑布之势。凡田畯园丁，取之不禁，减则补之，水常与阶平。更累土成阜，移山松之中材者植之，插棘为藩，截柴为门，种竹树为障，而构堂三楹于其间，题曰“茶山草堂”。或曰：古人有山水癖，有茶癖。但此地无一拳之石，一旗一枪之蘖，子何取而以名子之堂？虽然，名亦可取也。况余有同癖，得专其嗜于茶。凡山下种秫之田，当改而种卉，效甫里故事，岁入茶租，自为品第，以了此山一段公案。柴门反关，俗客不至。汲流泉，束散薪，隐囊纱帽，修然于林泉之间，亦足以老矣。”

庄园内遍植花木，点缀竹石，辟有垂柳曲径，饰以梅影参差，竹风潇潇，并筑梅花阁于其中，登高赏梅益增情趣。明末清初武进诗人董以宁（1629—1669）作《蒹葭庄看梅》诗云：

茶山曲径远闻香，柳弄新晴半欲黄。
有约翻嫌前度早，重来去忆少年狂。
寒花久待游人屐，芳榭遥邻牧马场。
指点园林无限思，几回箫瑟对斜阳。
百年时序总关心，眼见飞花更不禁。
石尉故国珠欲堕，银林旧路草全侵。
入邻漫拟郊居赋，望远谁传驿使音。
相对苍茫吾尔在，侧身天地月高吟。

蒹葭庄毗邻披裘公祠，而清冽湖畔更有绿蓑庵、明月廊、云外堂、学稽楼、众度庵、白荡芙蓉城等点缀在绿树丛中，引人入胜。明清时的王鏊、杨庭鉴、陈龙珠、钱名山等名人在他们的诗文中不惜用“花点客衣”、“莺啼春树”、“帘挂绿萝”、“霜醉平林”、“影云流水”或“远微迷茫湖水阔”，“芦花深处起渔歌”等词藻诗句来描绘赞美景园景和湖景。成为城南著名的风景区，难怪当时的人们说“茶山风景甲郡城”。



罗浮园

罗浮园位于常州北门青山桥北堍东，原为罗城城浜(护城河即现称关河)沿岸，明洪武二年(1369)新城墙移建后，在北塘河与城濠相汇处筑坝设闸，其坝周即成田陌。

此园人称罗浮坝，由吴充胞弟吴奕所建。吴奕，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进士，他也与两位胞兄一样，淡于仕进，隐逸山林，便于城郊建园。吴奕与其父一样，崇敬大学士苏东坡，故而取东坡“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④”之诗句名其园，称“罗浮园”。不仅如此，园内除建有堂楼厅榭外，还遍植梅花千余株，俨如梅园，盛放时节，满园缤纷，暗香浮动，人称常州地方的“香雪海”，引人入胜。罗浮园成为当时常郡最佳赏梅之地，邑人无不称羡，也成为了郡城南北两处相互呼应的赏梅地(即南有蒹葭庄梅苑)。至清代中期，此园易主，渐致荒废，罗浮遂成巷弄地名，久而久之，被讹传之为“罗武”^⑤，筑坝御河水之处，遂称罗武坝至今。

吴氏三兄弟所建三处园林，各具特色，为人称羡一时。常州历史上曾有过大小一百数十座园林，小的数亩，大的达三千余亩的宫苑(夏宫，隋炀帝行宫)，然而世事沧桑，由于战乱、朝代更替以及其他种种原因，绝大多数荒芜湮没。上述吴氏兄弟的园林，也曾在数易其主的过程中渐致荒废，如今有的空有其名，寻无踪迹，有的遗址尚存，查无实物，使人无限惋惜。

徐伯元，原常州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副研究员。

注释：

①赵翼：《瓯北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湛贻堂藏板。中华古典文学丛书。

②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一。

③⑤《江苏省常州市地名录》“常州地名来历简析”条目。

④罗浮山见《辞海》1477页条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苏东坡诗文全集史《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再前韵》咏梅诗中之两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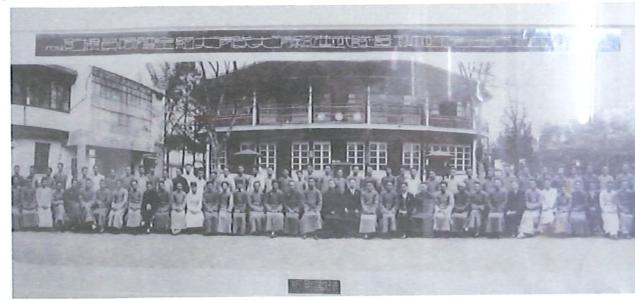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80年前的常州“公花园”旧景漫谈

张 军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特别是罕见的、与城市发展有关的老照片，往往能勾起人的回忆。近日，网友“绿色消融”向笔者展示了一幅长95厘米，宽24厘米，名为“江苏省土地局全省土地测量队武进县清丈组全体职员摄影”的大型黑白照片，这张照片带有常州人民公园前身“公花园”80多年前的背景，为世人了解常州古城风貌和商会办公楼原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此，收藏界业内人士表示，这张照片既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武进商会图书馆的“阅书室”

照片里的商会图书馆前的树木，其枝干比民国31年

(1942年)那张要略纤弱些，商会图书馆建筑看起来则更新一些，而且在商会大楼的一层中部上方还有“阅书室”三个较大的繁体字，表示当年这里确实具有公共阅读功能。这三个字在汪伪政权时期“武进县商会成立大会纪念摄影(民国31年10月5日)”的照片上已不存在。

商会图书馆为五楹二层建筑，其周围就是商会花园，这是全武进县最早的公园。根据《常州文史资料》第十辑杨树慧先生整理的《抗日战争前的武进县商会》一文可知：常州，在清末冶坊、染坊、织绢坊、蜜饯坊以及梳篦、打铁等雇佣劳动的独立手工业场和作坊已普遍发展。商业则以豆、木、钱、典四大行业为支柱。随着各业兴旺，商户众多，行业间迫切需要成立一个综合性行业联合组织，以维护同行和百姓的利益，于是，常州地区第一个商会组织——“武阳商会”于清光绪31年(1905年)正式成立，民国初年改为武进商会。

根据照片上这些规整的建筑可知，上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一带仍相当繁华。



东侧小洋楼即为商会办公楼

目前世面上有一张汪伪政权时期“武进县商会成立大会纪念摄影(民国31年10月5日)”的照片，该枚照片上有武进商会图书馆影像，而新发现的这枚照片除了有武进商会图书馆外，还有西侧的继正美术照相馆与二层楼房、东侧的小洋楼等多幢建筑，东侧小洋楼即为罕见的商会办公楼影像。

1907年，武阳商会以建商会多余的钱财和土地开辟后花园。民国二年(1913年)对公众开放，同年11月租赁忠义祠后空基4亩7分，筹建公园。1914年初，公园初步建成开放，成为常州第一个公园，时称“公花园”。

有不少市民会将武进商会图书馆当成是武进商会的办公地，甚至有人称，图书馆楼下是阅览室，楼上是商会办公地。

但笔者通过查询2016年6月对外发行的《民国武进商会档案史料汇编》后确认，商会图书馆与商会办公楼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而商会办公楼就在商会图书馆的东侧不远处，为二层洋楼，与商会图书馆亦中亦西的建筑风格不同，它是一幢颜色较浅的石质与水泥相结合的洋楼，外观较为简洁，为仿石库门建筑，高度与武进商会图书馆差不多，但体量略小些。此类建筑，尚能在上海中心城区见到一些，若

能留存至今，或能入选“优秀建筑”。

据《民国武进商会档案史料汇编》中《武进商会大事记》显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2月，时任商会会长恽祖祁用4900银元在双桂坊季子祠后院建成商会图书馆，共二层十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武阳商会在双桂坊延陵书院废基上建商会会所，费银5300元。该书中1938年12月《武进县工商俱乐部致常州宪兵分遣队函》显示：“查本邑武进原有县商会工业联合会会所及公园图书馆，全部系延陵季子祠及忠义祠旧址，由昔日商界集资陆续建筑设备，以充公用。”该书1919年10月《恽心耘追悼会文献》记载，恽心耘即恽祖祁，为商会前会长，死后由商会“在双桂坊商会会所开追悼大会。会场布置，门首高搭白布牌楼台座，上嵌恽公追悼会五字”。而“公园内图书馆楼下为公奠礼堂，礼堂门首悬松柏匾一方，中缀四字曰饮水思源”。由此可见，商会办公楼(会所)与商会图书馆并非一处，而是毗连。

商会图书馆曾作常州市群艺馆

1949年后，武进商会图书馆旧址改为常州市群艺馆。据新浪博客博友“明日阳光风雨后”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常州市群艺馆，有一个四面均为斜坡的西式屋顶，底座的石头台阶做得很高很规整，有楼上楼下两层，每个层面都有粉白色的天花板，还有人走在上面“嗵！嗵！”作响的木地板。更可贵的是门窗也都是全木结构的。尤其是窗户，很宽很高大。门也如同窗户一样，配有大块玻璃。这样既使室内敞亮，又可在必要时将门窗全部打开，以使室内空气流通。二楼南边有一条通长的大阳台，阳台的铁扶栏有一些简洁的花纹，一排柱子支撑着长长的屋檐。

“明日阳光风雨后”回忆，那时候，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可以活动的空间也十分有限，普通市民能涉足文化艺术领域的也就是群艺馆、文化宫等数得

过来的几处地方。群艺馆那幢楼不大，总共也就六、七百平米，但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里面有画室、乒乓球馆、练功房……还经常举办各种小型展览、培训班、专题讲座，群众表演等。每当夜幕降临，小楼上下更是灯火通明，管弦乐、大合唱、戏文、锣鼓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明日阳光风雨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印象，那就是门、窗、柱子、扶栏等都覆盖有一层淡淡的蓝绿色，虽已斑驳，仍显古朴、雅致和庄重。

常州市群艺馆在2002—2003年城市改造中被拆除，今遗迹不存。

继正美术照相馆

在这枚照片的右下角，盖有“继正美术照相馆、常州第一公园内”的横形钢印，字为两排。照片中的武进商会会馆西侧的一幢楼的一、二层间，也挂着“继正美术照相馆”的招牌。从照片能看出，继正美术照相馆就位于当时常州第一公园西大门的二楼，一楼为公园大门，供市民进出。这是目前仅见的继正美术照相馆的影像资料。

据现存的数枚照片可知，继正美术照相馆在民国时的武进县颇有名气，因“江苏省土地局全省土地测量队武进县清丈组全体职员摄影”和“武进县商会成立大会纪念摄影（民国31年10月5日）”这两张集体照均由该照相馆拍摄，从照片保存效果看，80多年过去了，照片中的人物仍是清晰可见，据此可知其照相水平之高。照片正下方还有“清华照相”字样，目前尚无法查到有关资料。

笔者了解到，常州有一家颇负盛名的照相馆——卢开照相馆，从方位看，就在人民公园西门外、继正美术照相馆的西面。笔者为此向武进著名摄影家汤德胜咨询两家照相馆是否有关系，他表示不了解继正美术照相馆，只知道民国时期，常州卢开照相馆很有名气。

随着时代变迁，西侧的继正美术照相馆和另一幢两层

楼建筑，以及东侧那幢2层小洋楼都已不存，这张照片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文物原貌。

老照片上有127人

这张照片的标题为“江苏省土地局全省土地测量队武进县清丈组全体职员摄影”，时间为民国24年4月（即1935年4月）。

据了解，民国19年（193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同年5月，经江苏省政府委员会决议，依照江苏省政府组织法，改设江苏省土地局，委任朱文鑫为局长，隶属民政厅，继续办理全省土地整理事宜，规划各县清丈制度，改进测丈队伍组织，民国20年（1931年）春，虽然频繁出现社会动乱和水灾，地方财政日益困窘，但是全省各县仍然能够积极推进业务，并制定了江苏全省土地整理程序表及五条原则，计划从民国20年起，分6期逐年陆续进行全省61个县的土地清丈工作。

民国21年（1932年），武进县土地局成立，开始实施土地清丈，测绘常州城乡大比例地籍图，直至民国38年初。其间，民国23年至26年，在常州城区及郊县施测了大批地籍图。常州所测地籍图内容有城市街区、农村村落、建筑物、河流等地物，规格为40厘米、50厘米，比例尺按乡、城郊、城区分为1：2000、1：1000、1：500三种。

清点这张照片上的人数，共有127人，这些人，其姓名已很难考证，但这张照片却既为他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也为常州人民公园的前身——“公花园”留下了倩影。

张军，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武进地方文联研究会会员。

邵长蘅与《邵青门文集》

杨金达

武进前黄东街向东不足二华里处，有一个小村落，四周小河环绕，河水清清，两岸翠竹绿树，郁郁葱葱，鸟语花香。村西北有一石桥（现为水泥大道）与外面相通。这个村落便是邵家塘，全村几十户人家，全姓邵，他们都是邵雍（谥“康节”）的后裔。邵长蘅曾生活在这里。

邵长蘅（1637年—1704年），明末清初人。字子湘，号青门山人，别号亦窝。原籍河南，邵雍的孙子于宋建炎年间随着宋政权的南迁到会稽落户，后经余姚、江阴，于元中叶著籍毗陵漳湟邵家塘，以耕读为业。邵长蘅的父亲邵海鸥，是地方上有名的大先生，好施舍，又急公好义，常常为乡邻排难解纷。邵长蘅的母亲是明崇祯十六年状元杨廷鉴的族姑，出自名门望族。他们对邵长蘅的教育抓得很紧，邵长蘅5岁便跟随塾师读书，每天回来必须背诵当天所学的功课，若背诵不熟练，便不让吃饭，一定要过关了才让吃饭。邵长蘅从小就用功，而且聪明，他进学不久，便能“即席占对，应声辄就，巧思胜于成人”。9岁便能写文章，“诵秦汉古文日数千言，下笔娓娓不能休”。10岁“补邑弟子员”（即进入县学），成为诸生。大家称他为“神童”。15岁那年，邵长蘅第一次参加乡试（即省级考试），文章已入闱；“五策”时因年轻气盛，联系现实，侃侃而谈，“多触忌讳语”，没有被录取，大家都很惋惜。20岁那年，邵长蘅再次参加乡试，当时张西山先生“视学江南”，很重视邵长蘅的文章，便“拔第一”。不巧其母亲杨氏去世，按规定邵长蘅又不能获选。24岁那年，邵长蘅又一次走进乡试考场，还没有来得及发榜，“江南奏销案”爆发，邵长蘅牵连其中，不但没有入选，连生员籍也被县学开

除了。“江南奏销案”牵连的乡绅、读书人一万三千五百多人，实际是清政府借口欠粮抗粮，打击江南地区对政府不满的达官士人，是清政府巩固政权的一种残酷手段。

一连三次乡试都没有被录取，对邵长蘅的打击很大，他决心“谢举子业，尽弃其少作”，认真攻读“三史、唐宋大家”的文章，同时“又潜心经学”，前后达“六、七年之久”，而后“山人之文乃大昌”，邵长蘅的诗文写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当时常武地区的文人，如董以宁、邹祇谟、方與、陈玉璿等人都愿意和邵长蘅切磋学问，邹祇谟对邵长蘅的评价很高，曾说：“吾邑有邵子，荆川先生后一人也。”

康熙三年（1666年），邵长蘅28岁那年，带着自己的诗文，开始外出游学。先后到达津门（即天津）、黄陂、豫章（南昌）、庐山、吴门（苏州）、山东阿城等地，前后共达14年之久。每到一处，和当地的文人酬唱，相互切磋，交流写作体会，邵长蘅的写作水平逐渐有了较大的提高。康熙十八年（1679年），邵长蘅43岁，第一次来到京城，进入王昊庐幕府。一时“名动京师”，宣城施闺章、新城王士禛、昆山徐乾学、黄冈王泽宏等在文坛上都是有“盛名”的前辈，竟然“皆折辈行与定交”，唯恐错失机会。京城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如“阳羡陈维□、秀水朱彝尊、盐官陆嘉淑、慈溪姜宸英、蕲州顾景星、宣城梅庚”等，常常与邵长蘅“花间分韵，月下论文，至午夜不倦”。不少人拿自己的诗文请教邵长蘅，邵长蘅也不客气，“率臆点窜，无所徇”。邵长蘅交了不少达官贵人的朋友，但他始终不肯凭着这些关系进入官场。这年秋天，邵长蘅听说蓬莱阁可以看到奇特的海市蜃楼，就兴致

勃勃地跨上驴子走了二千多里来到海边，乘船登上蓬莱阁，只见茫茫一片大海，天水相连，颇为壮观，但奇异的仙境并没有出现。邵长蘅从蓬莱回到京城，靠着亲友的推荐进入太学。邵长蘅参加太学“随牒试”的文章，阅卷的是吏部长洲宋文恪老先生，他看到邵长蘅的文章极口赞颂道：“今之震川（归有光，明代散文大家）也！”把邵长蘅“拔为第一”名。按照当时的惯例，只要交一点钱，邵长蘅便可以授予“州同知”一类的官职。在京的亲友也准备为他凑钱，邵长蘅笑笑说：“我凭自己的实力去考，考上就做官，考不上就不做。决不做用钱买来的官。”三年后，他很自信地踏进京城地区的乡试考场，结果仍然名落孙山。京城的亲友都劝邵长蘅留在京城再考。邵长蘅笑笑说：“我错了。我明明是五十多岁的的老太婆了，怎么还能跟着姑娘们‘倚门妆耶’？还是回邵家塘吧！草堂的松菊早就责怪我迟回去。”

第二天，邵长蘅就告别了京城的亲友，回到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邵长蘅虽然一直很想做官，但终生没有做过一天官。他是真正的布衣文学家。大儿子成亲后，他把家事全部交给大儿子处理，再次出门游历，忘情于山水之间。邵长蘅55岁那年，接受被康熙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的江苏巡抚宋荦的邀请，进入宋荦幕府，前后来去共13年。宋荦与王士禛、施闰章等被誉为康熙年间的十大才子，书诗画都很好，在文坛颇有影响。他很敬重邵长蘅，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常常一起游山玩水，相互酬唱。宋荦为邵长蘅《邵青门文集》作序；邵长蘅为宋荦编选了《宋氏先贤祠碑》《国朝三家文钞》《江左十五子诗选》《施注苏诗》《二家

（宋荦与王士禛）诗钞》等文集。这些文集对当时文坛空疏浮靡的文风起到一定的肃清作用。

邵长蘅一生致力于写作，给后人留下一部大书《邵青门全集》（又名《邵子湘全集》）和一部音韵学著作。《邵青门文集》共30卷。其中收诗11卷，约830首；收文19卷，共300多篇。邵长蘅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不乏精品，文学史上，常常把他与侯方域、魏禧并称为清初三大家。与邵长蘅同时代的散文家汪琬评论邵长蘅说：“人品似陆鲁望，文章似柳子厚。”宋荦评价他说：“子湘之文，立言必依于道。醇而肆，简洁而雄深。”曾任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评价邵长蘅说：“古文与侯朝宗（即侯方域）、魏叔子（即魏禧）称鼎足，诗浏漓顿挫，力追唐人。”诗人李必恒评论邵长蘅说：“先生之文无俗调，无长语，理醇气沛，简洁而有法。在本朝名家中当屈一指。”这些当时人中肯的评价，邵长蘅是当之无愧的。

邵长蘅的诗文受到清初“经世致用”的文风影响，他主张“文贵适用”，终生恪守“文以载道”的正统文论观。一部《邵青门文集》展示了明末清初种种社会面貌，深刻地揭示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尤其是他为抗清将军和遗民节烈之士所作的那些传记，写出他们抗清壮举和浩然激烈的正气，刻画他们鲜明的个性，历来被大家推颂为传记散文的经典之作。如《阎典史传》（该文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编入《高中语文》课本）叙述阎典史（阎应元）率领江阴全城六万余军民，面对二十四万精锐清军进攻，坚守江阴城81天的抗清业绩，他们共杀死清

军七万五千余人，其中包含清军十八位大将和三位王爷。全文没有对阎典史的一生作面面俱到的介绍，而是重点写他如何动员民众守城、如何筹集武器粮食、月下诵诗表明抗清心迹以及关怀爱护土兵等细节，用较多的笔墨详细描写激烈的战斗场面和他被俘后宁死不屈的壮举，阎典史的形象真实而饱满，浩然正气十分感人。《阎典史传》也是用文学的形式描写江阴保卫战的较早较出色的一篇。又如《欧敬竹、石士凤传》，明灭亡后，身为平民百姓的欧敬竹和石士凤竟先后自杀殉国。文章重点记述他们殉国细节，石士凤在欧敬竹死后数日，前去祭奠他，当天晚上，他自写灵牌“明布衣石士凤之位”后，便自沉忠义祠池殉国。忠义祠是祭祀常州太守文天祥等爱国将领之祠。欧敬竹和石士凤的生平，并无可举之事，但两人之死却节操甚高，可敬可悲可叹。

邵长蘅不少诗文，揭露时弊，关心民生疾苦，如实反映官府欺压 盘剥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如《促织谣》：

“促织复促织，凉秋八九月，新妇扎扎当窗织。一日织丈余，两日合成匹。婆言无襦，儿言无衣，翁欲易米煮餉糜。县中租吏来，叩门声如雷，阿翁趋办饭，阿婆烹伏雌。持布送租吏。租吏含怒言：“尔物何轻微！”新妇十指血，不得一缕穿，房中泪下如绠縻。”

诗中描写新妇为赶交租布日夜劳作，租吏还要呵斥，一家人只得忍气吞声。诗中用对照的手法，突现官府盘剥之重，展示老百姓的凄惨生活。又如《布谷谣》，邵长蘅在诗中描写农户悲惨的遭遇：“村墟五月布谷鸣，家家驱牛向田塍。谁令我家充里正，荒田地白不得耕。昨日县卒至，驱迫入城市。官府怒我输税迟，系狱一日再论笞……亲友来相探，泣下不能止，附书与亲友，归告我妻卖儿子。”因为没有及时交田税，关入狱中受鞭打，逼得老百姓只得卖儿卖女。官府重

税盘剥，老百姓无以为生的情形暴露无遗。

读着这样的诗，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唐朝白居易的《卖炭翁》一类的新乐府。邵长蘅正是承传了历代乐府诗“纪实讽世”的优秀传统而创作的。

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奏销案起，邵长蘅无辜受牵连，他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多次揭露。邵长蘅在给表兄杨简奄的书信中对案发时的情况作了如实描绘：“江南奏销案起，绅士诖误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余人。昨见吴门诸君子被逮过毗陵，皆锒铛手梏拳，徒步赤日黄尘中。念之，令人惊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

邵长蘅在《草堂杂兴八首》中回忆奏销案时写道：“事往间寻忆，犹惊三寸魂。登车当死别，还里愧余生。命托长镵在，诗称无佛尊。塞翁忘虑久，得失更休论。”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惊心动魄，可见江南奏销案给江南绅士文人留下的残害多么深刻。

无论是给抗清义士作传，还是揭露清政府的阴暗面，尤其是有关江南奏销案的文字，在当时是极其敏感的忌讳之词，那时正是“文字狱”盛行的时候，一不留心，会招来灭门之祸，不少人唯恐避之不及，邵青门却敢于直言不讳地把这些事实记录下来。邵长蘅的胆识和大无畏精神，真正令人钦佩！

邵长蘅大半生沉醉于山水之乐和朋友酬唱之中，因此在邵长蘅的作品中不乏言辞清新，意境闲适的诗文，表达作者崇尚自然、宁静淡泊、超凡脱俗的人生意趣。如《庐山游记》，一共写了六篇（《青玉峡记》《黄岩记》《玉帘泉记》《三叠泉记》《小三叠泉记》《栖贤谷记》），从不同侧面描绘庐山不同景色，每篇都抓住庐山多瀑的特点，重点描绘所见瀑布的形态、水势、响声及其周围的景色。写水充满灵性，写石状其

千姿百态的神韵，读来使人如临其境，神思飞扬。笔调徐然，神秀隽永，颇有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味道，尤可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相媲美。又如《青门草堂记》，这是邵长衡描绘自己住宅的优美短文：“堂凡五楹，翼堂而屋者，凡若干楹，不陋不华，足蔽风雨。堂之外，环而溪者，以里许，溪清而甘，可酿；溪之上，藩而圃者，以亩计，可蔬；环溪内外而田者，以顷计，可种可粳。环而峰者，皆在十里外，苍烟晴翠可支颐而眺。此草堂之大概也……独自幸所为草堂者，托先人敝庐，无结构之劳，无播迁兵革之患，与族人父老子弟力衣食而课农桑。间以其暇，临溪而渔，登高而赋，徜徉田园，行役余齿，以视子美所得又何如也。”

这篇短文如实地记述了草堂的布局构造、周围的优美环境、以及生活其中的乐趣。通篇文字清新舒缓，简洁明朗，充分表达作者耕读田园自由自在的闲适之乐，确实可与杜甫成都草堂相媲美。

邵长衡对草堂生活写了好几首诗，如《夏居漳湟里》《草堂述怀三首》《青门草堂八咏》《田居诗八首》等。这些诗写草堂优美的田园风光，表达作者田园生活的自在闲适，与《青门草堂记》的短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田居八首之二》“鸡鸣披衣起，躯犊向东菑。豹声吠深巷，寥寥人语稀。残月出林梢，草露沾我衣。农务今正亟，力耕戒乘时。岂敢营温饱，庶免素餐饥。”《田居八首之八》：“小筑营茅栋，篱斜对国山。藤阴萦屋老，树色到门闲。野竹青千个，溪流碧一湾。吾庐真自爱，飞鸟倦知还。”

这些诗语言清新自然，诗风平淡淳朴。有的写老家的辛勤劳作，有的写漫步在草堂的青山绿水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作者清高脱俗的气质，沛乎其间。这些诗具有陶渊明田园诗的风味。

邵长衡一部分羁旅诗也写得很出色，表达他羁旅他乡的苦闷、寂寞、凄凉的心境，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读来也很感人。如《冬夜遣闷效黄山谷》。邵长衡抱着“以史为鉴”的宗旨，针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写了一部分史论，如《唐太宗论》《诸葛亮论》《褚遂良论》《李德裕论》《陈蕃窦武论》等。这些史论篇篇都有独到的见解。这是作者向清朝政府提的建议，可惜没有引起清统治者的重视而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部《邵青门文集》内容十分丰富，是作者留给我们不可多得的文学遗产。可惜常武地区的学人热衷于对外来文人的研究，对土生土长的邵长衡却知之甚少；更可惜的是，邵长衡晚年靠朋友的帮助，自己印刷《邵青门文集》，印刷完后一千多块全是银杏树制作的雕板，藏在草堂的阁楼上，邵长衡交代后人保管好，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解放前夕，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先后出高价征集，邵氏后人出于尊重祖先的遗物，没有同意。没有想到这些雕板却毁于文革“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中，他们把雕板的刻字刨平做语录牌，写上毛主席语录，插在田头。至今，这些雕板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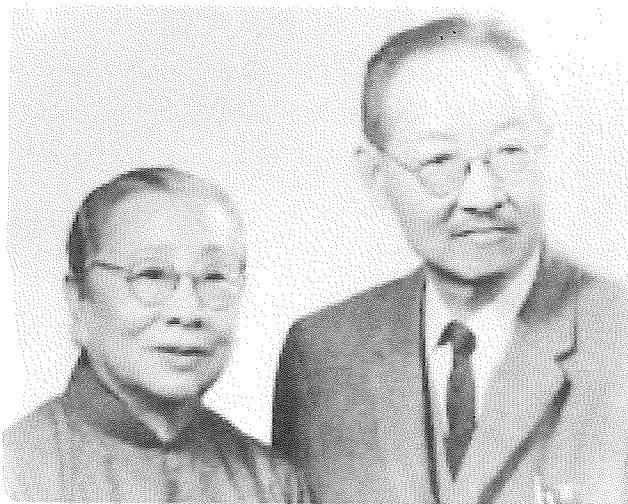
杨金达，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退休教师，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参考文献：

- 1，《漳湟邵氏宗谱》和《邵青门文集》
- 2，朱雪萍：《邵长衡诗文研究》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陈伟堂



1982年早春，享誉世界的“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念着唐诗告别人间，在美国麻省剑桥去世，终年90岁。

赵元任（1892年—1982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文理兼修，极有语言天才，在语言学领域着力最深，在音乐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多门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的方言，因此得了个“赵八哥”（“八哥”是“鹦鹉”的别称）的绰号。

常州人素来喜欢把望族官宦人家称为“大人家”，赵元任是常州的世家子弟，由于长期受家族良好的文化教育影响，往往在常州当地起文化和道德的“风向标”作用，受人尊敬。赵元任是宋太祖赵匡胤第31代孙，清代著名历史学家、乾隆“江左三大家”赵翼（字瓯北）的6世孙。1892年11月3日赵元任生于天津紫竹林，曾祖父赵曾向（字朗甫）是赵翼的第四个孙子，青果巷16弄赵元任故居，就是时任浙江金华知府赵曾向建于清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的巨宅。赵曾向次子赵执诒因任冀州（今河北）直隶州知州，赵执诒全家遂定居于天津。赵执诒于清光绪27年（1901年）去世后，赵元任

随父母护送祖父灵柩回常州归葬，遂定居于青果巷祖宅。赵元任幼时由父亲赵衡年在故居教授《书经》《左传》等古籍，在此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青果巷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常州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江南名巷和“中国名人之巷”，堪称常州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为了迎接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在2018年“开街”，赵元任故居正在进行自清咸丰年建造至今160年以来的大修，今年将完成维修工程。这也是常州人和国内外语言学界和音乐界人士长期以来的迫切愿望。

赵元任儿时在北方长大，随着祖父任官地点的变动，差不多每年要换一个地方生活，四岁住磁州，五岁住祁州，六岁住保定，七岁住冀州，八岁住保定，九岁住冀州，十岁回常州（1901年）。随着居住城市的变动和接触人物的多样化，赵元任所处的语言环境在不断变化，环境激活了他的语言天赋。他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为了不忘自己是常州人，祖父特地从常州请来了家庭教师，从家庭教师那里他又学会了常州话，并能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他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1906年，赵元任在溪山小学（即今局前街小学）读书，溪山小学名为小学，实则介于中、小学之间，原址即明、清常州府的“龙城书院”，学生大多数来自知识家庭，学校老师也大多为当时的名宿。自1906年以后，赵元任一直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到：“我们最敬爱的老师名吕诚之（吕思勉），教我们中文和历史。”1907年至1910年，赵元任考上了在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被列入预科一年级，这实际上是一所专科学校，预科相当于高中。赵元任回忆道，“我们这个年龄的学生大多数向往革命，认为满清政府来日无多。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我们得俯伏在灵堂前叩头，赞礼人高呼‘举哀！’时，我们全都低着

头，齐声大笑（大哭），没有人能分辨出我们是在笑还是在哭”。宣统二年（1910年），18岁的赵元任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官费生，在录取的72人中名列第2，胡适名列第55。他与胡适、竺可桢等同船赴美，与胡适同进康乃尔大学，赵元任读数学、物理，1914年同期毕业。赵元任转哈佛大学读哲学，1918在哈佛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又获谢尔顿超博士研究奖学金，在芝加哥大学和柏克莱大学多方涉猎。赵元任求知不倦，涉猎广博，而不落“死记硬背”，除了科学、哲学，兼好语言、音乐，还有“玩儿”。所以，后来的赵夫人杨步伟在回忆录《杂记赵家》中说：“这几十年我总觉得元任是能不要钱总是不要钱，有机会学总是学。”1919年，康乃尔大学聘赵元任作物理讲师；1920年，赵元任应聘为清华大学心理学及物理学讲师。

1920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蔡元培、蒋百里等人共同推荐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由于赵元任口齿清晰，知识渊博，每到一地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才华得到了公认，他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研究方向。罗素的演讲涉及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数学、逻辑、物理、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赵元任都应对自如。而且，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罗素在杭州讲演时，赵元任便以杭州方言来翻译；他在去长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学会了长沙话，等到了长沙，他又能用当地话翻译了，以至于讲演结束后，一个学生跑上来问他：“赵先生贵处是湖南哪一县？”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到江西、福建，进入浙江、江苏、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就在赵元任为罗素来中国讲学做翻译这一年，他结识了日后成为他妻子的杨步伟女士。杨步伟的曾祖父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杨步伟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开设私立森仁医院，为风气之先。赵元任与杨步

伟的结婚仪式是完全新式的，成为20世纪20年代北京乃至全国的一大新闻佳话，开了时代新风，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赵元任夫妇草拟并印制结婚通知书，当时有人建议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的印花税，才算合法。这婚书和寄亲友的通知书如下：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医士恭敬地对朋友和亲戚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个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十年六月一日（就是西历1921年6月1日）3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告诉诸位，他们结婚的仪式是如下：第一节，第一段，甲本人和证婚人签名如下，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征女医士。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年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他们申明，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第二天北京《晨报》上登出了“新人物的新式婚姻”为大标题的报导。

婚后，赵元任夫妇又到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进修语言学理论。1925年，清华大学决定办研究院，并聘请“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他们又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赵元且回清华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赵元任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6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退休后又继续执教数年，前后从事教育事业凡50多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可谓桃李满天下。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任所长，赵元任作为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20世纪20年代初，白话文运动已成气候，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主要语言汉语读音不统一，这严重影响中国文化的推进，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常州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吴稚晖、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是研究先驱。赵元任开始进行汉字拼音化推广，他编辑灌制了《国语留声机片课

本》，胡适为该书作序，称以留声机片教国语没有第二人比赵元任更合适，该书最大长处在辨音的正确，如辨声调辨方言等，且书中用语活泼诙谐，可以破除历来教科书的沉闷。赵元任在汉语研究领域的成就主要是：区分字调语调，重视对汉语连续变调与轻重音的研究，提出汉语语调雏形，对汉语语调进行形式、功能的划分，指出“未来”语调研究的方向方法。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辗转镇江、丹阳、无锡、宜兴、溧阳等地，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回到北京后，他将搜集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此书出版时，语音符号准备采用国际音标，但当时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这本书成为研究吴语和方言的珍贵文献资料，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赵元任每到一地都要对当地方言进行记录整理，适时出版，赵元任晚年还喜欢用常州话吟诵古诗文。

赵元任根据发音系统和主要现代方言，从《康熙字典》的数万多字中挑选出2000字，作为“通字”，他认为日常行文用这2000字就够了。他的这本《通字方案》一直不肯轻易脱稿，反复斟酌，思虑再三，一次一次地修改，还征求国内语言学家的意见。1979年，赵新那到美国探望父母，年近88高龄的赵元任，每天还坚持坐在书桌前研究《通字方案》。

1937年抗战开始后，清华、北大等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一起内迁至四川、云南等地，几所大学组成西南联大联合办学，赵元任一家到了昆明。1938年，由于特殊的原因，赵元任夫妇全家到美国，先后执教于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并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主席和会长，并加入了美国籍。1945年，赵元任一家从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二战结束的消息，欣喜若狂，他们开始做回国的准备。1947年，深爱祖国的赵元任正准备回国任教，并让二女儿赵新那夫妇先回国准备接应，忽然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因为那时，赵元任的好友胡适已回国当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仍任清华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这就是赵元任最终没有回国的真正原因。赵元任在国内有很多朋友，许多中外学术界的有

名人物都与他相交甚深，如刘半农、张奚若、金岳霖、陈寅恪、杨杏佛、傅斯年、梅贻琦、胡适、蒋梦麟、朱家骅、吴有训等。但赵元任从不愿意做官，认为自己不宜（不喜欢）做行政工作。另外，赵元任认为他毕生研究的语言学在国际上也很需要，并认为“一个中国人在国际上有名也是给中国人留名”。1947年11月，赵元任因教育部来电，他与杭立武代表中国到墨西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1948年，赵元任当选为中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从此，赵元任执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1962年在该校退休。

赵元任还被中国音乐史上开基创业的一代宗师、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萧友梅称赞为“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赵元任的音乐创作，开始完全由中国人独立作词作曲，使中国近现代音乐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他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之一，是我国20世纪20年代优秀的作曲家。赵元任的音乐创作活动虽然开始于“五四”运动以前，但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后的代表作有《劳动歌》《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听雨》《也是微云》和合唱曲《海韵》等，共14首，收集在由商务印书馆于1928年出版的《新诗歌集》中。30年代，他还为陶行知等人的许多儿童诗谱写了歌曲。赵元任在艺术上勇于创新，他创作的歌曲，音乐形象鲜明、风格新颖、旋律优美流畅，富于抒情性。赵元任的声乐作品艺术水平较高，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创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赵元任于1926年创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已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宝库中的经典。进入21世纪，《教我如何不想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20世纪亚洲经典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对立导致两国民间互不来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对于时刻思念祖国的海外游子来说，能在有生之年回到家乡看看，是他们最大的心愿。1972年，随着尼克松总统的来访，中美两国恢复交往，民间来往也逐渐增多，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先后回国探亲。1973年，赵元任以美籍华人、国际著名语言学家的身份携夫人杨步伟回国探亲，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赵元任高兴地在北京



会晤了许多老朋友、同事和学生，参观了许多地方，更令他感动的是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和夫人杨步伟。周总理说，赵先生在清华教书的时候，他曾经想去清华听赵元任的课，跟他学语言学，但由于赵元任当时在给罗素当翻译，未曾实现，也未曾见到赵先生。赵元任听了非常感动地说“幸亏没有跟我学语言，不然中国可就少了一个好总理”。周总理还与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在座的还有郭沫若、刘西尧、吴有训、竺可桢、黎锦熙等，周总理设宴招待了赵元任夫妇一行。回到家乡常州青果巷，赵元任终于看到了魂牵梦绕的赵家老宅。他沿着青果巷走了一圈，在与亲友谈话时，赵元任说一口流利的常州话，当有人说：常州话难听，赵元任却说：“常州话其实很好听”。9年后的1981年5月下旬，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这一次回国，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已在不久前去世，他是在女儿赵小中等人的陪同下回常州探亲的，赵元任在侄儿赵与康的搀扶下又来到了青果巷，走了很长一段路，在老宅的楼上楼下看得非常仔细。早在1927年，赵元任夫妇与后来的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祖籍常州，先祖是朱元璋的驸马，明初到天津任职）一起来到常州老家住了三天，并拍下了常州老城、青果巷和老宅的许多照片，为常州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侄儿家正好有一架室内小风琴，在女儿小中的风琴伴奏下，赵元任兴致勃勃地唱起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在北京录制音标时，赵元任发了400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在北京他还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教育部长蒋南翔亲自为赵元任戴上

北京大学校徽，曾经的学生王力教授致词，并用“高山仰止”来表达他对老师的尊敬，吕叔湘教授也在仪式上致贺词。赵元任则非常谦虚地说“不敢当”，并称自己是个“落伍者”。在北京，赵元任一行还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邓小平对赵元任一行回祖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问及回国和回家乡常州访问的观感，赵元任说，他感到北京和家乡常州的变化很大。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右上角刊登了邓小平接见赵元任的照片和报导。

中国数千年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曾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特别是时光进入20世纪后，在中西方文化冲撞与交融的大背景下，更是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才思横溢、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从而又大大丰富了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使之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赵元任是这些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最优秀的一位，他为世界和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陈伟堂，常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常州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特邀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海外学者文丛，关鸿、魏平主编，1997年1月第一版。
- 2.《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吴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北京。
- 3.《一个女人的自传》，杨步伟著，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1987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4.《赵元任：永远的常州人》，戎林海、赵与康，2016年6月26日《常州日报》。
- 5.《常州名人故居汇编》，常州市房产管理局产权监理处，2001年10月。
- 6.《扬子晚报》人物揭秘《语言学家赵元任人称“赵八哥”》2016年8月27日。

“白璧完操”赵申乔

赵德明

赵申乔是清代康熙朝以清廉著称的高官重臣，他有政声，清白刚正，但宦海凶险，难独善其身。然则清者自清，牌坊上的“白璧完操”四字是朝廷对其最中肯的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值得后人景仰。

赵申乔(1644—1720)，武进嘉泽观庄人，字松伍，又字慎旃，号白云道人，康熙九年进士。初授河南商邱知县，后擢浙江布政使，又升任浙江、湖南巡抚，左都御史，户部尚书。一生以刚正清白闻名。

赵申乔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不惧权贵，施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善于处理各种棘手政务，受到康熙的赏识，当属清代早期颇有作为的名臣。康熙三十年，赵申乔由当朝大臣李光地推荐，越级提升为浙江布政使，新官上任，他轻车简从，率先垂范，整顿吏治，革除陋习，“钱粮悉自己监收，火耗分文不取”，短短数年“浙江局面为之一新”。任湖南巡抚时，面对苗民叛乱，他只身前往，无所畏惧，恩威兼施，使叛乱很快平息。康熙曾赞赏“虽不娴军旅，但立定主意，便无畏怯”。另一方面，他自恃清白，性格刚烈，行事偏激，凡事不肯退让而饱受非议。在他任职之处几乎和其他官员都有过节，在户部时更是和满族尚书穆和伦经常争执，各行其是，形同水火，最后导致穆和伦辞职，激化满、汉官员整体矛盾，引起康熙的不满和反感，为日后大祸临头埋下祸根。应该说，康熙和赵申乔君臣共事几十年，既相互依靠相互欣赏，但又恩怨交集。除了性格脾气不同以外，君臣分歧更多的还是反映在治国理念和经营策略层面，因此君臣关系始终十分复杂微妙。因而，赵申乔要在波谲云诡的政坛仕途中始终保持“清节”是尤为艰难的。

评价赵申乔，绕不开“南山集”案这个坎。康熙五十年，身为左都御史的赵申乔上表参奏时为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指出“所作书内，将本朝年号销除，将永立

年号写入等大逆不道之语”等，把戴名世送上被告席，最终致使三百多人受到牵连，或诛杀或入狱或流放，堪称前清第一惨案。后人认为赵申乔是罪魁祸首，“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但也有人认为，对于历史人物，还是要尊重事实，冷静客观，杜绝狭隘的民族感情，不受简单化推测的误导，从而得出一个比较能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结论。

首先，赵申乔当时为左都御史，“参奏不规”是其职责所系，无可非议，用今天的话说是“职务行为”，否则当属“不作为”。

历代封建王朝都设有御史一类的官员（不同朝代可能名称不同），以监督百官，弹劾不规。从当时戴世名编辑《南山集》来看，其中关于南明政权史实的部分材料，引用桐城另外一名学士方孝孺所著的《滇黔记闻》，书中所记南明之事，皆用南明年号，戴在转录引用时又未作任何修改，无论动机如何，已经触犯朝廷禁令，因此赵申乔参奏是十分正常的。

现有文章指责赵申乔“参奏戴名世”有“公报私仇”之嫌，是指戴名世和赵申乔之子赵熊诏一同参加康熙四十八年的殿试。结果赵熊诏高中状元，戴名世仅为榜眼，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言外之意就是本来这状元应该是戴名世的，是赵申乔做了手脚，排挤了他。这个观点很有煽动性，在民间有一定市场。其实这个假设是经不住推敲的。历朝历代朝廷开科取仕，都要经过多场多次严格的考试，一路过关斩将，即使进入最后殿试，也有数百人应试参加，不是两个人考试，非你即他。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都是密封的，考官也有十来个，总考官集综合意见才能排出名次，供皇帝定夺，所以即使赵申乔有此意也是无法实现的。当然，戴名世在先前的礼部会试中中了“会元”，水平很高，呼声很

大，但谁又能保证他在殿试中也能“独占鳌头”呢？历史上能“连中三元”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而且，从时间上看，赵申乔“参奏戴名世”已在康熙五十年，科举考试早已尘埃落定，名次已分。赵申乔为何还要“耿耿于怀”再来“参奏”呢，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其实，从“南山集”案的全过程来看，本质上是康熙对这一案件的直接操控，乘势打压，赵申乔不过是“挡箭牌”“替罪羊”而已。

康熙雄才大略，一生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但对内一直对汉族文人士大夫密切关注，多次炮制“文字狱”，箝制思想，敲山震虎，以使大清江山稳固。我们不排除康熙早就对戴名世的“南山集”已经高度关注，一直要找个突破口，而这事由赵申乔来完成是最为确当，因为赵申乔是左都御史，本身职责就是“检举揭发”，“名正言顺”，合乎朝纲，而且赵申乔又是“汉臣”并一直以“清白刚直”闻名。一旦参奏立案，康熙就穷追猛打，深挖广牵，最终造成牵涉到三百多人命运的大案，惨不忍睹。有人说赵申乔在参奏戴名世之初，没有想到结局会是这样，真是悔之晚矣。其实这更能证实康熙才是此案背后的真正推手。有文记载，“南山集”案诛连戴名世、方孝标两家，三代之内，年16岁以上男丁俱处死，母、女、妻、妾及15岁以下之子都罚给功臣家为奴，此外还有参与刊印与收藏及知情不报和处置不力的人员一概治罪，后来康熙为收买人心只斩了戴名世，对其他人等酌情宽免。但这些当事人及亲戚、朋友、同僚并导致社会的普遍舆论无不都把赵申乔视为第一罪人，而此时赵申乔纵然再有委曲也是有口难辩了。

除了“南山集”案外，“赵凤诏被诛”案对赵申乔的名声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赵凤诏，赵申乔次子，自幼聪颖，康熙二十七年高中进士，后任山西太原知府，显赫一时。康熙五十四年被查，康熙怒斥为“天下第一贪官”，康熙五十七年被斩。

有文章讲到赵凤诏被诛是对赵申乔制造“南山集”案的报应，这多少有些牵强附会，他们主要还是乘机指责赵申乔一贯做事太绝，特别在“南山集”案中更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触犯众怒，所以关键时刻没有一个大臣同僚为其求情。

赵凤诏表面上犯的是贪污罪，是经济案，据称曾贪污受贿二十万两（一说三十万两）白银，实质上是卷入“太子党”，是政治案，这是问题的实质。康熙一朝，曾两立太子，但康熙从来没有放权的意思，最后逼得太子铤而走险，用非常手段夺权，引起康熙雷霆大怒，他对官员结党现象最为痛恨，从不手软。因此在赵凤诏案上，他根本不等所谓贪污受贿二十万两白银的查抄结果坐实，另以“违旨”罪处死，全然不顾和赵申乔几十年君臣合作共事的情份，暴露出冷酷无情的一面，这对于赵申乔来说，可谓“颜面尽丢”了。

赵申乔、赵凤诏父子同朝为官，命运却大相径庭。赵申乔不愧官场老将，不结党，不营私，胸怀坦荡，对朝廷忠心耿耿，为康熙所欣赏和倚重。但反观赵凤诏，年少气盛，目空一切，投机取巧，依附权贵，导致杀身之祸，这恐怕也是所有从政官员要引以为戒的。

赵申乔死后，康熙曾传旨：“赵申乔效力多年，清勤自勉，简任司农，实心办事，忽闻溘逝，朕心深为轸恻，应得恤典，著察例具奏。”后谥“恭毅”，赐谥碑文云：“以尔小心匪懈，故曰恭；以尔大节不扰，故曰毅”。雍正元年，朝廷追赠“太子太保”。雍正二年，朝廷还在其家乡新建牌坊和陵墓，陵墓建在嘉泽乡丰野村委黄塘，前有甬道，两边有数对石人石马，文臣武将高大威武，另有华表，以耀业千秋。牌坊建在其老宅嘉泽乡观庄村前，为四柱三门有檐结构，牌坊正中石匾正面大书“白璧完操”四字，为当时两江总督范时绎、江苏巡抚陈时夏、江苏学政邓鍾岳等三位高官合议题，“白璧”指其品质纯洁，“完操”指其操守完美，表彰赵申乔一生为官从政忠诚清廉的品德操守。但十分遗憾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赵申乔的陵墓和牌坊均被毁坏，目前仅存牌坊石匾一块，长约二米，宽约四十厘米，厚约三十厘米，表白文字为浅刻，历经三百年仍清晰可见，已被列入常州市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赵德明，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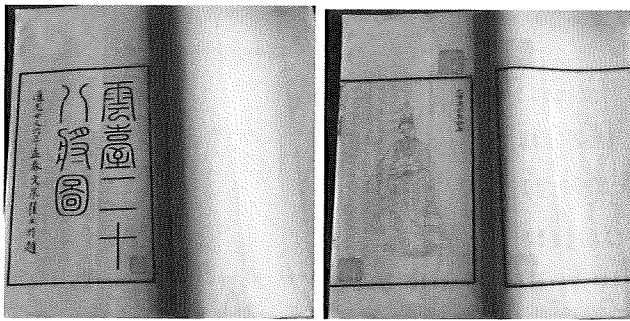
陶湘与《云台二十八将图》

府军

以类求书书不同，巧于弃取绍陶公。

藏书岂若传书久，欲散家资养刻工。

此伦明先生《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所描述的近代藏书家、刻书家武进陶湘所作诗。世人皆知陶湘喜藏开花纸本，故被称为“陶开花”，而其所藏明刊刻套印本、汲古阁本及武英殿刻本之精之好，也广为人称颂。然陶湘最大之功却在于不独藏私家珍秘而精心出版。自1922年起的十年间，陶氏刊有《喜咏轩丛书》《百川书屋丛书》等各种珍秘古籍250余种，或精工摹刻、或珂罗版及石印，均尽善尽美，流传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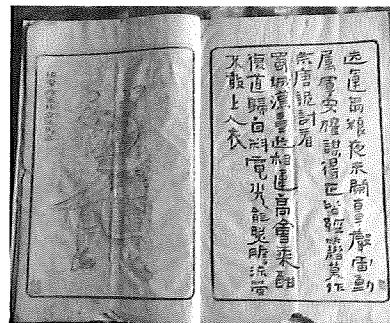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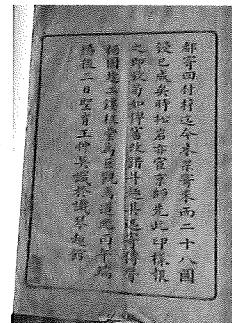
图二

十多年前，在海上拍场偶见此册陶湘石印本《云台二十八将图》(图1,2)，起拍价为一千元。当时买家在意明清刻本，故被我一千元即轻松竞得。付款取书后，见此书前后钤印达九方，为张之铭古欢室旧藏。张之铭，宁波大藏家，他对此书也珍爱有加。此册《云台二十八将图》被陶湘收入《喜咏轩丛书》丁编，陶湘多为重刻珍本或影印本，故此书常被认为陶湘影印本。然细读此书，方知陶湘以收得原刻《云台二十八将图》为样本而重刊此书，陶氏重新编排又补原书未竟之志而成，此又与丛书其它之本有不同之处。此本陶氏以小开花纸精刊，流传不广，版画为著名画家张士保精绘底本，而原

本据陶氏记载流传绝少，偶一见之。《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也称“道光金陵原刻，极珍稀”，可见陶湘藏本之佳。



图三



图四

藏书之道讲究缘分，一年后在南京一场古籍拍卖会上，一册略有破损的《云台二十八将图》(图3、4)清刻本走上了拍场，惊喜之余迅速比对陶湘石印本及进一步查证有关资料，确认此册赫然就是道光原刻本。由于该书保存不佳，起拍价仅为一千元，真是我志在必得之书！记得当时天津资深书友缪先生等二人同坐举牌不放下，书价迅速上窜至七千元，待拍卖师报至“七千第一次，七千第二次，还有没有加价？”之际，我缓缓报出七千五百元，竞拍书友第一次放下号牌，而拍卖师此时落槌声响，竟比我预算的少了好几万，惊喜仍然连连。买下此书后发现，书倒数第二页尾部钤有“陶湘私印”小章，此章与上海图书馆所藏陶湘收藏古籍钤章完全一致。查陶湘藏书大都经由伪满州国最后流入东瀛，小部分散出，或许此册确为陶氏旧藏原本。世事变迁，古物依旧，这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并屹立于世界之颠的精神所在吧！

府军，南京藏书家，书画师从祝嘉。现就职于江苏真德拍卖有限公司。

博物馆的“门面”需要精心呵护

——谈谈博物馆展览的日常维保

张 瑶



近年来,随着文博事业的蓬勃发展,博物馆的展览陈列备受社会关注。国内稍具规模的博物馆大多有常年开放的基本陈列和常设展览,这些展览投入成本大,存续时间长,是博物馆对公众开放、执行社会教育功能的重要设施。遗憾的是,不少博物馆固定陈列的日常维护不尽如人意,例如灯具损耗未及时更换、多媒体设备故障无人维修,展示效果因此大打折扣,有损观众的观展感受。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物对展出环境有特殊要求,需要维持一定的温湿度,倘若展厅内的恒温恒湿设备因维保不善而无法正常运行,会对文物造成一定的损害。目前国内博物馆(尤其是中小型博物馆)在展览的日常维护方面鲜少形成严格的规章制度,有制度的也常常囿于维保资金不到位而无法切实执行。很多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刚建成开放时光鲜亮丽,不久以后就因日常维保不到位而失却原貌。重建设而轻维护,是很多博物馆展览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拟对博物馆展览日常维保工作进行几个方面的总结与阐述,希望能引起业界同仁对这一

问题的重视,加强展览维保制度的执行力度,共同维护博物馆常设固定展的基本面貌,为观众带来更好的参观体验。

(一) 展厅照明系统的日常维保

灯光照明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而复杂的设施,一套设计合理、视觉效果良好的展厅照明系统需要精心的维护。文物在展览期间受到的最大伤害常常来自灯光照明,可见光、红外线、紫外线都会使文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基本陈列和常设展的展出周期长,对文物的保护尤为重要,因而展厅照明应选择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灯具。

根据布展照明方案设计,每个灯位都有其专门的照明任务,有的负责空间照明,有的专注于器物纹饰的重点照明,有的司职于墙面展板的照明,无论哪一个灯不亮了,都会对整体展示效果造成一定影响。有些博物馆展览灯具损坏的情况比比皆是,展厅内明暗斑驳,严重时甚至看不清展品外观,给观众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参观体验。因此,对长期开放的基本陈列及常设展来说,照明系统的日常维护、更换

和保养就显得非常重要。

各博物馆可以根据展厅实际情况制定照明系统的维保制度,平时由展厅安保人员密切关注展厅灯具的状态,发现损坏及时记录灯位并报修。大多数免费开放的博物馆都设定了每周一天的闭馆日,这一天适合进行各种设备的维护检修,包括更换损耗的灯具。此外,每周应进行一到两次例行巡查,展陈部门人员与电工一起沿展线巡视,记录损耗的灯位,检查灯光照射区域是否移位,根据巡查结果制定灯具更换及维护方案,并及时实施。为了不影响观众,应尽量在展厅内观众少的闭馆清场之际,安全无干扰地进行换灯、调光等维保工作。

除每周例行检修外,每年应安排一到两次展厅照明系统的集中维保。维保内容主要包括电器、灯体结构及光源三部分。其中,光源更换是集中维保的最主要工作。目前大部分博物馆展厅中还是以卤素光源为主,其正常寿命在1000—3000小时,在长年开放的常设展厅中,损耗是无法避免的,需要每年固定更换。随着展厅照明系统使用年限的增加,灯具及其配件日益老化,更换将更加频繁。因工作量较大,施工专业要求高,这一维保项目需延请专业公司进行施工。灯具材料费及人工费总额较高,需在每年下半年列入次年的预算向上申报,并与专业公司签署正式的维保合同。

(二) 展厅多媒体设备的日常维保

近年来,各地博物馆基本陈列和常设展中各种多媒体设备的运用日益普及,包括大屏幕投影系统、多点触摸互动系统、三维投影立体沙盘、幻影成像、虚拟演示、视频音频播放等。形式丰富的多媒体展示方式有效地弥补了实物展品的不足,为观众提供了更全面、更生动的资讯。做好展厅多媒体设备的维保工作,确保它们安全、正常地运行,是博物馆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但是些博物馆的展厅多媒体设施缺乏有效维护,设备经常出现故障无法运行,观众询问展

厅里的值班安保人员,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已经坏了很久了”。一些中小型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和常设展,在最初的一两年里,展厅配备的多媒体设备运行还比较正常,因为在合同规定的维保时限内,出现故障可以得到及时解决。但时间一长,超过机器硬件的保修期后,随着设备的逐渐老化,故障日渐增多。如果不制定科学的维保制度,有计划地进行日常维护,这些耗资不菲的多媒体设备很快会丧失它们原有的功能,成为一堆冰冷的废铁。

与展厅照明系统维保项目一样,多媒体设备的维保由于工作量大、维护成本高,每年所需的费用必须及早申报,并与专业公司签署正式维保合同,以确保日常维护工作能正常进行。展厅多媒体设备以投影机和电脑为主,每年维保工作的重点是投影机除尘保养、投影机灯泡更换和电脑设备检修维护。一些博物馆展厅面积大,展线长,多媒体设备总数动辄上百台,落实到每台机器的维护保养,总体工作量还是相当大的。仅以投影机为例,维保内容包括:每台投影机一年两次除尘保养,含整机拆装、光学镜片清洁,主板、电源板、液晶板除尘,过滤网清洁,散热系统保养,图像输出检查及色彩校准等等。投影机灯泡有一定的使用年限,正常约为2000—4000小时,博物馆展厅每天正常开放约8小时,投影设备连续运行时间长,损耗大,根据其机器运行情况,原则上每台机器每年需要更换一次灯泡。

此外,日常巡检制度的执行也必须确保。维保公司需提供每周一到两次例行巡查服务,沿展线查看展厅内所有多媒体设备的工作状况,以便及时排除故障,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在“十一”黄金周、春节假期等观众量急剧增多的时段之前,也应要求维保人员安排全面巡查检修,以保证展厅在假期中正常开放。

(三) 展厅温湿度设备的日常维保

目前国内大部分博物馆展厅的环境温湿度主要依靠空

调系统调节,很多博物馆还为文物展柜配置了先进的恒湿机设备。展厅温湿度设备的工作状态直接关系到文物在展出期间的安全,对观众的参观体验也有一定影响。由于展厅空调系统和展柜恒湿设备属于两种不同的专业范畴,应选择不同的专业公司分别进行维护保养。

展厅空调系统的良好运行,对营造舒适宜人的参观环境至关重要。尤其是冬夏两季,室内环境温度尤其依赖空调系统。博物馆方与空调维保公司可根据展厅实际情况制定合同条款,确保每年对展厅空调系统进行二到四次全面检修维护,服务内容大致包括:冷却塔维护保养、空调机组检测保养、空调水管网清洁养护、电机检修更换等。每次全面检修后,维保公司应向博物馆提供详尽的检测报告。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保障展厅正常开放,维保公司应承诺及时响应博物馆的故障报修要求,尽量做到当天报修当天处理。

除空调系统外,恒湿机也是为文物提供安全展出环境的重要设备。根据文物保存环境的不同需要,专业恒湿设备可向展柜内不间断输入相对湿度在35%—75%的温和气流,将展柜内的微环境控制在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范围之内,为文物提供一个稳定而适宜的环境,从而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鉴于其专业性强,恒湿机的维护保养应委托该行业的专业公司进行,服务项目大致包括:每季度对展厅内所有恒湿机进行一次常规检修及保养,如冷凝器的去污除尘清理、蒸发(除湿)器的除尘清洗、循环风叶清洁、加湿器的除垢清洗、电器控制系统的检修等等。为保证设备的日常运行,维保公司还应为博物馆展厅工作人员提供恒湿机使用保养知识培训,并对恒湿设备监控系统的软件及时更新和升级。出现设备故障时,维保公司应及时响应博物馆方的报修要求,派遣维修人员尽快赶到现场排除故障,并向博物馆出具书面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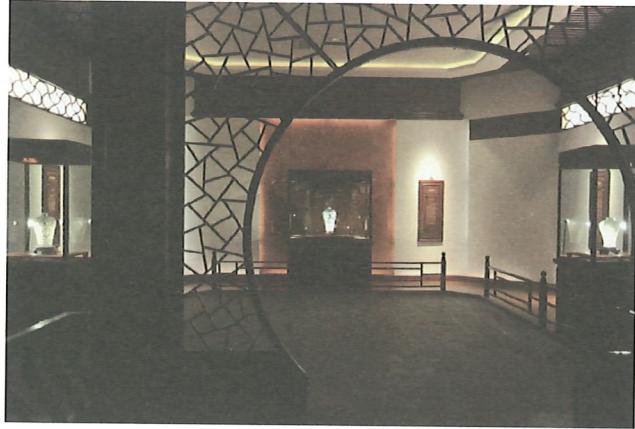
(四) 常规展陈设备的日常维保

展厅内的常规展陈设备通常包括展柜、道具、支架、展板、场景、辅助展品等。博物馆应根据本馆展厅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维保制度。展柜外部的清洁保养可以结合展厅的日常保洁,由展厅保洁人员负责每天进行展柜玻璃的清洁、除尘。安保及展览部门人员应定期检查展柜锁具的安全、展柜主体外表状况,如有锁具艰涩失灵或柜面金属油漆脱落等情况,应及时安排更换或修缮。展墙上的图文展板等也应定期检查,如有版面起泡、脱胶、破损、悬挂不牢等情况,应及时报告展览部门,安排更换或修复。定期检查展厅内的场景现状,雕塑、人偶、装置等辅助展品的外部清洁由展厅保洁人员负责,如发现破损、老化、变色等严重影响展示效果的状况,也应及时上报,由展览部门作出相应处理。

(五) 展柜内部的清洁维护

展柜内部的清洁度是基本陈列及常设展日常维护中不可忽略的一个要点。由于使用材质和制作工艺的不同,各类展柜的密封性能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较流行的金属材质展柜密封性较好,即使长期展出,展柜内的浮尘积灰也很有限,不至于影响观瞻。但仍有相当多的博物馆展厅很久未作提升改陈,使用的展柜还是比较老旧的材质和工艺,特别是那种与展墙连为一体的固定展柜,通常使用木质或合成板材制作,展柜的密封性较差,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凭肉眼观察到柜内展台表面的浮尘,柜内陈列的文物也不可避免地笼罩着一层浮灰。针对这样的情况,博物馆应制定相应的措施,安排时间和人手对展柜内部进行擦拭,根据柜内灰尘的累积程度,每年进行一到两次全面除尘。

由于牵涉到文物安全,这项工作至少需要由展览、保管、安保三个部门共同参加。首先要拍摄展柜内的现状照片,目的是记录每件文物在柜内陈列的具体位置,以便清洁工作完成后按原样恢复;打开展柜后,将柜内文物逐一转移到柜外安全地带;之后柜内除尘和文物清洁可以分头进行,



保洁人员进入展柜，依次清洁展台、道具、支架、说明牌、展板表面、玻璃内壁等，展陈及文物保管人员则在柜外安全地带对文物展品进行细致的清洁除尘；两边的清洁工作都完成后，再将文物重新放回展柜，根据事先拍摄的柜内状况照片将文物逐一布置到位。一般来说，基本陈列展线长、展出文物数量多、展柜情况复杂，这项柜内全面清洁工作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相当大，几乎相当于重新布展，远不是一个工作日就能完成的，可以利用每周的闭馆日，分片、分阶段进行。

(六) 展馆维护保障

展览维保需要一定的资金保障，各类维保项目的年度费用都不是小数目，必须列入博物馆每年的预算中。根据现行政策，维保公司必须通过招标比价选定。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价格并不是选择合适的维保公司的唯一标准，最重要的是该公司的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准。有些企业为了争取项目，报价远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需要格外警惕，不合理的低价格是无法保证维保服务质量的，这样的公司由于可用资源有限，很难做到及时响应故障保修要求，也无法保证每周例行巡检的实行。有效的维保无法正常实施，最终受损的还是

博物馆方。因此，在选择维保公司时，要深入考察该公司的资质，在价格合理的条件下，优先选择从业时间长、业内口碑好、有过博物馆展览维保经验的公司。

除了必须确保的专项资金投入外，还需要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和细致耐心的工作态度。据笔者近几年在国内多家博物馆的参观体会，并不是经费充裕的大馆就一定能做好展览维保工作，最重要的还是相关从业人员对展览维护的自觉性和责任心。曾有次参观一家新馆建成开放不到一年的省级大馆，建筑恢弘，设施先进，但一些小细节却让人感受不佳，例如一些陈列漆木器的展柜，为维持环境湿度，展柜内原本放置了盛水的玻璃量杯，但杯内的水早已蒸发殆尽，柜内角落里干涸的空量杯就显得分外刺眼。这样的小事与经费多寡无关，却反映了管理者维保意识的淡漠。类似的事在多家博物馆都曾遇见过：展柜灯不亮，触摸屏不灵光、温湿度记录仪数据爆表、文物展品上罩着厚厚一层灰……这些现象影响了博物馆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反映了博物馆从业人员对展览日常维保工作不够重视，也不利于展览中的文物保护。

长期开放的基本陈列和常设展是博物馆的“门面”，需要所有工作人员的精心呵护。希望本文阐述的观点能获得业界同仁的认同，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展览日常维保重视起来，让博物馆的“门面”焕发应有的光彩。

张瑶，南京市博物馆综合业务部，副研究馆员。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博物馆服务创新策略

许佳

一、“互联网+”与博物馆

“互联网+”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指的是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以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务体系、重构商业模式等途径来完成经济转型和升级。笔者认为“互联网+”中的“+”意味着跨界和革新。“互联网+”将互联网作为当前信息化发展的核心特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业态，从而推动社会发展新形态的演进。

2012年11月，易观国际董事长于扬在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首次提出了“互联网+”的理念。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指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其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是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主题，被称作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引擎”。可见“互联网+”对当前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了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互联网和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中创造一种新的生态。

随着互联网技术及平台的高速发展，网络应用的广泛普及，网络用户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使博物馆所处的社会

环境在不断变化，公众对博物馆的功能及形态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些无疑给博物馆事业发展注入新的催化剂。进入“互联网+”时代，博物馆原有的传统经营管理和服务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广大游客的游览需求，博物馆事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能在“足不出户，便知天下”的网络世界，充分利用资源发挥好博物馆职能，提供创新的服务，成为博物馆人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互联网+”背景下的博物馆服务，是利用互联网思维来解决博物馆服务的问题，推动服务形态随着社会环境和发展不断地发生演变。实际上这并非是两者之间简单的有机相加，而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及信息通信技术，让互联网与博物馆服务深度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服务形态。

二、博物馆服务创新路径探讨

2015年颁布的《博物馆条例》第三十四条明确指出：“博物馆应当根据自身特点、条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社会交流合作。”可见，信息化和互联网思维已经成为博物馆社会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贯穿于博物馆各项工作，也渗透在博物馆服务的方方面面。

(一) 科学管理藏品数据资源

习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利用计算机技术，摆脱文博场馆对藏品信息的局限，以高效、快速、受众面广的优势扩大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作用，提高藏品的社会认知度，提升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适应时代和观众对博物馆服务的要求。“互联网+”时代，以电子技术挖掘藏品信息，并建立藏品资源信息数据库，转变博物馆藏品信息载体。同时，又便于博物馆内各部门以及博物馆之间藏品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实现馆藏信息的科学化管理。除了具有安全性、经济性的特点，更有助于博物馆进行现代化馆藏数据的整理、提取与保存。

（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互通

博物馆信息化服务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务，应成为博物馆各部门通力协作的共同任务。博物馆应建立部门间信息互通管理机制，确保信息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建立馆内信息化管理机制外，还应注重馆际间的信息沟通，加强博物馆之间多种交流与合作。如搭建馆际间信息交流平台，打破地域、行政级别的限制；整合馆藏文物、藏品资源；通过博物馆区域间合作、总分馆制等办法，形成博物馆馆藏资源共享平台，有针对性地解决大馆、省馆文物藏品闲置而基层中小博物馆藏品匮乏、缺少基本陈列的问题，真正意义上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

（三）建立信息服务机制

1.展览服务“线上线下”相互独立、互动共荣

建议成立独立的网络展览部，将博物馆的展览工作，完全独立成馆内展厅的实物展览与网络虚拟展览两个部分。采用“线上—线下”展览“分轨、并轨与相互交叉”的思路，在博物馆原本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适应与协调观众对网络服务的需求。

馆内展厅的实物展览、跨馆文物的特展，仍由博物馆的传统标准，构成博物馆展览工作的基本核心。其次，线上展览工作要形成自己的基本核心工作，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1)与博物馆藏品相关的或不相关的文化、教育等展览主题，通过图鉴、媒体、纪录片等形式在门户网站形成专属线上的展出；(2)文物本身是具有“多种意味”与“多种价值”的，尊重藏品本身的多样性，把握其不同的故事背景，可以将更多的藏品组合，在网络虚拟展览中以不同的主题和背景来展览，更有利于将文物本身的多样内涵，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不断地通过多种组合传达给观众。最后，是“线上、线下”两个展览部门的工作协作，共同完成同一主题的不同侧面的展览。

同时，通过信息化服务，可以开展博物馆“线上线下”互动的活动。如活动开展前，先在媒体上做活动宣传造势，活动开展期间运用图片、文字、视频等方式对活动内容做实时报道，活动结束反馈观众感受，并对获奖观众给予相应的奖励。通过这种方式，增加博物馆的社会关注度，贴近公众，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

2.网络服务的整合

随着互联网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数字化网络服务的展示手段在博物馆的展览中的作用也越发重要。目前我国博物馆网络服务发展，主要以两条线并行发展：官方网站在更大的层面上保持传统的发展模式；移动设备端服务则以多种方式独立探索。现在各博物馆一般会推出IOS和Android系统的移动APP或者微信公众号，将实物展览及真人语音讲解全程推送到手机客户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微信等互联网社交手段，当人们通过扫描二维码就能观看全部实物展示中的博物馆，这就使得博物馆网络服务的发展策略在宏观层面进一步的整合成为可能。

今后博物馆所提供的网络服务首先需要在宏观的层面

进行统一，门户网站和移动设备端的内容需要一致，所不同的只是现实的技术手段与外观形式，以避免从视觉、内容与功能上对观众产生误导。统一的内容结构方便观众快速找到所需要的服务与功能。

引入云端技术，实现门户网站与移动设备端的云同步功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博物馆网络服务使用过程中多平台设备的快速切换与完全定制化资讯的推送。即同一功能的一次使用过程，可以快速更换设备并衔接前面的工作，而无需再次繁琐的操作；收集观众合理范围内的使用习惯与兴趣数据，建立分析库，形成按照具体某一位观众兴趣，完全定制化资讯的推送。

3.反馈信息的采集与分析

博物馆，不仅是公益的，也应该是公众的。“未来的博物馆不应再是曲高和寡、阳春白雪，而应主动聆听公众的声音，在博物馆收藏、展示、教育等决策方面多参考公众的意见，根据各界的反馈对各项工作作出相应的调整”。在“互联网+”时代，借助于互联网等多媒体手段，博物馆工作更应该从公众的需求出发，提升观众的参与度，进而深入了解一段文化，一段历史，激发观众的历史情怀，提升民族自豪感。

在博物馆新的网络服务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建立必要的观众反馈信息采集方式与分析手段，而最直接的分析方式莫过于观众的参与度。反馈信息的采集可以通过讲解员现场听取观众、场馆问卷调查、信息平台的收集三种方式获得。其中，信息平台的收集是最有效也是最经济的方式。信息平台上相关门类信息的点击、查阅量可以直接反映出观众需要了解什么。根据相应的分析结果，可以制定新的策略。而社交媒体方面，可以与社交媒体官方进行合作，获得不同类别资讯观众的转发与参与程度的数据进行分析，制定新的策略。此外，结合博物馆自身的互动机制，通过观众参与的程度与文字的反馈，形成合理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机

制，制定新的策略。通过采集信息可让工作人员对展览的实际效果进行调研与换位思考，从观众的角度出发，设计开发出更受欢迎的展陈方式及博物馆社会活动，从而真正实现博物馆服务“从观众中来，到观众中去”的宗旨。

(四) 加强智慧馆员的培训

馆员的业务水平、服务意识和道德素养直接影响着博物馆的整体服务水平。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馆员的职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馆员不再局限于简单地从事实物资料的加工整理和陈列展览等工作，而应转变为对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加工以及通过利用数据挖掘、分析等知识技术为观众提供针对性强的参考咨询服务，甚至还可为观众提供定题服务、课题研究等高端服务。因此，博物馆需要打造一支有能力、有实力的馆员队伍，在引进精通计算机等专业人才的同时，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培训。馆员在精通自己业务的基础上，可积极地进行最新服务的宣传推广，从而扩大博物馆创新服务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三、面临的问题与展望

(一) 技术、资金、人才资源不足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未来的博物馆服务新形态应是全方位、多元化，博物馆需要借助信息化来指引博物馆服务水平发展。做好这项服务，需要强大的技术、资金及专业人员的支持。我国的绝大多数博物馆，都是公立博物馆。在财政、人事政策上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如果通过招标，采取与第三方专业公司合作的方式，在优化资源、节省开支的同时还能用专业信息技术完善博物馆信息化建设，释放博物馆的巨大潜力，提升博物馆服务的水平。

(二) 信息安全的维护

博物馆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且难以解决的问题——信息安全。博物馆在挖掘用户信息的同时，带来一系列的用户隐私数据的安全防范问题，因此，在“互

“互联网+”环境下，用户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是博物馆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信息安全是博物馆对内共享资源，对外做好社会服务的基础，对于它的维护显得尤为重要。应当采取以下五种措施：1、保养硬件设备，建立网络安全防护系统；2、采用安全性高的非移动存储设备，对数据进行保存，避免移动设备意识造成的安全隐患；3、对信息安全进行专业培训，强化网络安全及防范意识；4、做好信息访问权限的设置，防止内部信息的外泄；5、建立博物馆网络防火墙并做好信息备份工作。

（三）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信息化助力博物馆服务”是当代博物馆工作的核心。然而，目前的有关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年修订版）第四章第四十六条规定：“修复馆藏文物，不得改变馆藏文物的原状；复制、拍摄、拓印馆藏文物，不得对馆藏文物造成损害。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不可移动文物的单体文物的修复、复制、拍摄、拓印，适用前款规定。”在文物数字化的过程中，仅有“复制、拍摄”条款并不足以支撑“互联网+”时代下博物馆数字化、信息化的进程。国务院在2015年发布的《博物馆条例》对此也惜墨如金。如3D打印技术，或类似于传统的文物复制，但又有区别，传统概念的复制品是同种材料的复制，而目前的3D打印技术无法做到这一点，仅是外形相似。当然未来如果技术进步，或许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复制。因此，为适应信息化的浪潮，这两部与我们博物馆行业息息相关的法律急需补充和完善相关的条款。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传统社会教育的一个关键点，博物馆在新的社会背景与技术条件下，运用互联网技术对博物馆进行创新与改革是大势所趋。博物馆应当顺应时代进步的感召，用更快捷、更高效、更先进的方式拓展服务领域。我们需

要积极创新博物馆的服务模式及策略，强调人的需求，重视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加强对馆员专业素质的培养，以适应“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抓住机遇，从而提升博物馆的服务质量，更好地发挥其传播知识、启迪智慧和培养创造能力的功用。

许佳，武进博物馆考古学术部。

参考文献：

- 1、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92%E8%81%94%E7%B-D%91%2B/12277003#4_4
- 2、赵竹青：《学者热议：李克强提的“互联网+”是个啥概念》，《人民网》2015.3.5.
- 3、马化腾：《“互联网+”激活更多信息能源》，《光明日报》2015.5.9.
- 4、尹亮：《新华网评：中国有了“互联网+”计划》，《新华网》2015.3.6.
- 5、Annis Sheldon 认为，“‘多意味’和‘多价值’——即是说他们在不同的组合中分别述说着不同的含义。参见：Annis Sheldon, The Museum as a Staging Ground for Symbolic Action, Museum, No.151 (Vol.39, No.3), 1986.
- 6、乐俏俏：《博物馆形象塑造与媒体沟通的关系解读——以浙江省博物馆为例》，《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

博物馆里幸福年，携手种下“幸福树”

——武进博物馆庆元旦活动

“元”有初始之意，“旦”指天明之时，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在2018年第一天，15组亲子家庭走进武进博物馆，共同参与了“博物馆里的幸福树”创意木工活动。小朋友们从最基本的绘制开始做起，切割、拼接……一步一个脚印，种下他们心中的“幸福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大家齐心协力将一棵棵“幸福树”制作完成。小朋友们还用画笔给幸福树涂上颜色，挂上红包，放上福袋，写下他们的新年愿望。

在新年第一天，武进博物馆携手大家种下“幸福树”，通过汗水和付出让小朋友们感知“幸福”来之不易，同时也种下自己的新年祈愿。

在新的一年里，武进博物馆将继续推陈出新，开展更多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让广大未成年人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



TIME

2018年1月1日

博物馆里幸福年，携手种下“幸福树”

——武进博物馆庆元旦活动

武进博物馆

博物馆里贺新春，红红火火过大年 ——武进博物馆迎新年活动

大年初一，武进博物馆正式开启2018狗年新春系列活动。在浓浓的新春氛围中，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拆红包、做吉祥“汪”！

活动期间，我们在博物馆大厅放置了一棵特别的“幸福树”，上面挂满了喜庆的红包。过往游客可以摘下红包，在幸福树下合影留念，感受不一样的“年味”。红包里面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春节小知识、文物小故事还有来自博物馆的美好祝福。运气好的人，还能获得各种2018年活动免费体验券。

同日下午，在少儿社教体验区，我们结合狗年生肖文化，开展了一场“吉祥汪的博物馆之旅”创意木工活动。18组亲子家庭在喜气洋洋的节日里，共同参与了制作吉祥“汪”的活动。

武进博物馆春节教育活动参与活动人数近3000人，在观众中取得了良好的口碑。今后，我们将结合传统节日，拓展思路，继续做好未成年人教育工作，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寓教于文、寓教于乐。



TIME
大年初一

博物馆里贺新春，红红火火过大年——武进博物馆迎新年活动
武进博物馆

巧手制作兔子灯，喜迎佳节乐淘淘

——武进博物馆元宵节活动

元宵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3月2日下午，20位参与者走进博物馆，参加了“博物馆里过元宵·巧手制作兔子灯”活动。

通过“元宵知多少”小讲座，孩子们了解了元宵节的由来、传说和习俗。猜灯谜是元宵节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寓意着喜气洋洋，平平安安。在妙趣横生的灯谜前，大家积极参与，竞相解答，在参与中收获快乐，在快乐中增长知识！

今后，武进博物馆将继续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精神，不断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以传统节日为契机，组织开展适合广大未成年人的教育活动。



TIME
3月2日

巧手制作兔子灯，喜迎佳节乐淘淘——武进博物馆元宵节活动
武进博物馆

拥抱新时代，放飞中国梦 ——武进博物馆清明节活动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中华民族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4月1日上午，18名青少年走进博物馆，参加了“拥抱新时代·放飞中国梦”武博清明节活动。

通过清明知识小讲座，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相互分享自己了解的清明节习俗与故事，并一起朗诵了唐代杜牧著名的诗篇《清明》。

古代放风筝不但是一种游艺活动，更多的是为了祈求放走晦气，消灾解难。现如今，放风筝已经成为清明节最受欢迎的活动。本次活动我们特意设计了制作风筝的环节。风筝制作完成后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放飞风筝。

此次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一个放飞梦想、释放活力的平台。我们通过清明小知识讲座，制作风筝等环节，带领孩子们穿越时空，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优秀文化魅力。



TIME
4月1日

拥抱新时代，放飞中国梦——武进博物馆清明节活动
武进博物馆

百舸争流赛龙舟，传统文化永传承

——武进博物馆端午节活动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武进博物馆开展了“龙舟竞渡·百舸争流”武博端午节活动，20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我们通过“端午知识小科普”环节，让孩子们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

众所周知，武进太湖湾是全国龙舟竞赛基地。我们和孩子们带着满满的自豪感，一起观看了端午节赛龙舟的短片，了解了乘风破浪、百舟竞渡的龙舟运动，学习了团结拼搏、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并亲自制作了一条小龙舟。

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得到我们的尊重与珍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不断激发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TIME
6月16日



百舸争流赛龙舟，传统文化永传承——武进博物馆端午节活动
武进博物馆

武进博物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源自文化遗产日，是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文化建设重要主题之一，旨在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文化遗产，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节日活动中来，共同保护、传承好宝贵的文化遗产，武进博物馆结合节日主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常幼牵手武博•非遗走进校园”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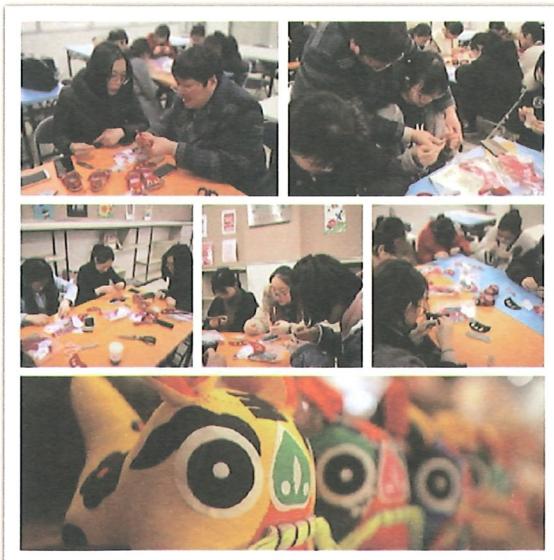
武进博物馆围绕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常幼牵手武博•非遗走进校园”活动以构建博物馆、高校与非遗传承人交流合作的模式，发挥各自所长并整合三方优势资源，积极推动常武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前期，三方通过密切联系，互相探讨，分别在武进博物馆建立“常幼校园实践基地”，在常州幼儿师范学校设立“非遗大师工作室”，意在通过学术研究、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培育等方式对“非遗”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与传承。今年，我馆正式推进了校园课程的开设。截止目前，三位非遗传承人在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共开设17堂非遗专题课程，广泛培养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真正突显非遗传承的“传帮带”作用。

“行走的博物馆——武进博物馆文化行”活动

“行走的博物馆——武进博物馆文化行”活动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通过展示相关法律法规、武进博物馆馆藏精粹、武进历史文化名人以及武进博物馆近阶段工作成就等内容，先后在富克斯流行广场、武进新天地公园、武进区人民政府等地进行巡回展出，获得良好社会反响。活动突出文化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的作用，推动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

今后，武进博物馆将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提高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良好社会氛围。



TIME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武进博物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武进博物馆

我们的博物馆日

作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科普教育示范基地，武进博物馆一直致力于社会教育工作的新探索。近年来，通过邀名家，请名师，携手有志于博物馆教育课程研发的有识之士，在省内率先创建博物馆文化体验联盟，开发博物馆教育活动课程。

三年来，武进博物馆与全国少先队储宁玲名师工作室、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洛阳中心小学、卢家巷实验学校等密切合作，围绕“我们看武博、我们读武博、我们爱武博”三大主题，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先后举办“我们看武博——博物馆课程之旅启动仪式暨馆校共建挂牌签约仪式”“我们读武博——博物馆教育推广人启动仪式暨武进博物馆教育蒲公英课程研讨会”“我们爱武博——博物馆教育读本《蒲公英丛书·龙城风情》新书发布仪式”。我馆通过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文化传承活动和馆外拓展活动等，开创博物馆教育新视角、感受博物馆教育新魅力、深入博物馆教育新探索。

今年，博物馆教育读本《蒲公英丛书·龙城风情》的对外发布，不仅是我们三年来成果的体现，更是我们送给大众的一份礼物。它通过灵动、轻松、幽默的笔调，以故事的形式为大众了解常武地区悠久的历史和深邃的文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验。

未来，我们将继续整合更多优秀的教育资源，凝聚成合力，基于我们的“节日、非遗、馆藏、名人、展览”，采用更多新方法，拓展博物馆社会服务新空间，让更多的公众走进博物馆、驻足博物馆、爱上博物馆！



TIME
5月18日

我们的博物馆日
武进博物馆

“我们的展览”配套活动

我是小小茶艺师

茶，是中华民族最古老醇朴的饮料。茶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它与国学一脉相传，相辅相承。3月18日下午，15组亲子家庭走进武进博物馆，参加了“我是小小茶艺师”活动。

孩子们换上统一的汉服，一个个“小小茶艺师”就有模有样了。大家通过参观“古韵茶香——镇江博物馆馆藏历代茶具精品展”，对古人所使用的茶具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茶文化知多少”讲座环节，孩子们积极参与，了解着茶的知识，品味着茶的芬芳，体验着泡茶的乐趣，在悠悠茶香中领略着浓浓茶文化的魅力与精神。最后，孩子们还将自己亲手泡的茶敬给长辈，表达了自己对长辈们的感恩之情。

此次活动以轻松活泼、寓教于乐的方式，令孩子与家长拥有了一次意义非凡的亲子互动经历。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对中国的茶道有了深入的了解，使大家懂茶礼，知茶性，重茶德，提高了个人的修养，更是加深了家长和孩子们的交流与沟通，拉近了彼此间的亲子关系，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

TIME
3月18日

我是小小茶艺师
武进博物馆



笔尖上的瓦当

瓦当是古代中国建筑中覆盖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是古代建筑的重要构件，起着保护木制飞檐和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5月26日上午，武进博物馆围绕“延寿长相思——安康博物馆馆藏秦汉瓦当展”，开展了“笔尖上的瓦当”教育活动。15组亲子家庭参与了此次活动。

孩子们首先参观了展览，展厅里一件件纹饰精美的瓦当吸引了大家，讲解员精彩的介绍更是让大家对瓦当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的“瓦当知识小科普”让孩子们更深入地了解了瓦当的文化，知道了瓦当的起源、用途、纹饰等相关知识。“屋檐上的艺术——绘制瓦当画”环节，更是让孩子们跃跃欲试，宝相花纹、立鹿纹、卷云纹、长乐未央……各种纹饰跃然纸上，色彩鲜明、创意多多，一幅幅属于自己的瓦当画诞生了。

本活动很好地将书法绘画与博物馆元素融为一体，以轻松活泼、寓教于乐的方式，带领孩子们了解了秦汉文明，树立起保护古建的意识，使参与者经历了一次意义非凡的体验。



TIME
5月26日

笔尖上的瓦当
武进博物馆

开卷有“艺”——武博读书月系列活动

在武进区第二届读书月活动期间，武进博物馆紧紧围绕“书香武进·悦读人生”活动主题，开展了“走进文人书房·体验古书装订”教育活动、小博士图书角——“我爱读书”、参观“八百年不熄的神灯——祭祀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等一系列活动。

“走进文人书房·体验古书装订”教育活动

4月21日、4月29日，两场“走进文人书房·体验古书装订”教育活动吸引了30名青少年走进博物馆。他们了解书籍装订的发展演变、学习古书装订的技巧，并亲手装订了一本属于自己的古书。在活动中，孩子们欣赏了古书外在的装订工艺之美，探索了古书内在的文化之美，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小博士图书角——“我爱读书”活动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早读书。”在武进博物馆的“小博士图书角”内，珍藏着众多和博物馆相关的书籍，包括博物馆科普、传统文化、历史故事、名人传记等。我们希望在观众参观之余，能为大家提供更多阅读资源，在潜移默化间培养大家的阅读意识，提高大家的阅读能力。读书月期间的每个双休日，已有百余名参观者走进“小博士图书角”，领略了书籍中的博物馆。

八百年不熄的神灯——祭祀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

看展览，也是一种阅读的方式，这种精神的旅行，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在读书月期间，我馆引进了“八百年不熄的神灯——祭祀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丰富的展品向人们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活跃在内蒙地区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地域文明，感受不一样的阅读体验！截止目前，参观观众已达3万余人。

近年来，武进博物馆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依托馆藏的珍贵实物，利用多媒体设备的互动体验，提供文史书籍的阅读平台，让社会大众走进博物馆、阅读博物馆，了解历史、感知历史，从而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TIME

4月21日 4月29日

开卷有“艺”——武博读书月系列活动

武进博物馆



文房玉·闺阁金 ——明清江南地区时尚生活展

2018年1月24日—3月20日,由贵州省遵义市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常州玉润堂共同举办的“文房玉·闺阁金——明清江南地区时尚生活展”在贵州省遵义市博物馆举办。

此次展览精选了我馆馆藏明清时代金银饰品、常州玉润堂收藏的明清文房玉器120余件(组)进行展出,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41件。藏品再现了明清女子金饰插戴之华美、士人文房用玉之精致。通过展览,让公众一起探求当时社会生活之幽微,追寻一段金镶玉砌的江南浮华生活。



TIME
2018年1月24日—3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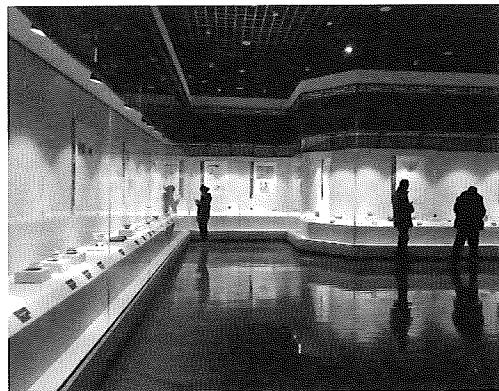
文房玉·闺阁金——明清江南地区时尚生活展
贵州省遵义市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常州玉润堂共同举办

古韵茶香

——镇江博物馆馆藏历代茶具精品展

2018年2月16日—3月25日，由镇江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古韵茶香——镇江博物馆馆藏历代茶具精品展”在我馆举行，共展出镇江博物馆馆藏历代茶具精品85件(套)。

镇江处于长江与运河两条黄金水道的交汇处，水陆交通便利，自六朝以来，即为长江下游商品中转港口。东南茶叶，南北各窑茶具经长江和运河运抵镇江，向东入海运往各地。镇江博物馆收藏的茶具除传世的外，历年来，在墓葬、窖藏、城市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制茶工具和饮茶器皿。本次展览从中精选出历代具有代表性和不同品种、不同质地的茶具，以使观众窥豹一斑而领略中国古代茶具的精美。



TIME

2018年2月16日—3月25日

古韵茶香——镇江博物馆馆藏历代茶具精品展
镇江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共同举办

至美疆风 ——杨凡工笔画贺春展

2018年2月3日—3月5日，由常州市文广新局、常州市文联、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常州市武进区美术家协会主办，武进博物馆、常州龙董影视策划有限公司承办，江苏华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常州英诺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常州业勤纺织有限公司协办的“至美疆风——杨凡工笔画贺春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杨凡工笔画五十余幅。

画家杨凡教授出生地阿勒泰地区，与武进区政府对口援疆地尼勒克县所属的塔城地区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辖的两大地区。杨教授从小浸润于北疆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其画作充满了极强的地域特色，其画展自然会将“至美疆风”随着新年春风吹向武进大地，进入千家万户。这是一次新疆和武进的文化交流盛会，是落实十九大关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精神的一次重要活动。

TIME
2018年2月3日—3月5日

至美疆风——杨凡工笔画贺春展
常州市文广新局、常州市文联、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
常州市武进区美术家协会主办
武进博物馆、常州龙董影视策划有限公司承办
江苏华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常州英诺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业勤纺织有限公司协办



八百年不熄的神灯

——祭祀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

4月3日—5月22日，由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八百年不熄的神灯——祭祀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鄂尔多斯蒙古族特色精品文物197件。

展览分为“成吉思汗与鄂尔多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鄂尔多斯传承的蒙古汗国宫廷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游牧民族文化”四个单元，以成吉思汗与鄂尔多斯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展示十三世纪以来鄂尔多斯蒙古族保留的近两百件民俗文物，来表现以祭祀成吉思汗为核心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馆多次引进全国各地博物馆特色展览，是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的指示精神，加强文化交流与互通，同时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领略到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感受草原人民的豪情壮志。

TIME

4月3日—5月22日

八百年不熄的神灯
——祭祀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
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共同举办



延寿长相思

——安康博物馆馆藏秦汉瓦当展

5月26日—7月31日，由陕西省安康市文物文化广电局、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主办，安康博物馆、武进博物馆承办的“延寿长相思——安康博物馆馆藏秦汉瓦当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秦汉时期精品瓦当80方。

本次展出瓦当，其中少部分为安康出土，其余均为安康籍收藏家宋云石先生在民国时期从西安、咸阳等地收集，并于1953年捐赠给政府。这批瓦当为秦汉都城遗址出土，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秦汉瓦当，将书法与绘画、制砖工艺与雕刻艺术融为一体，极具观赏价值。由此可以窥见秦汉时期的建筑美学、人文历史、社会生活和精神追求。



TIME
5月26日—7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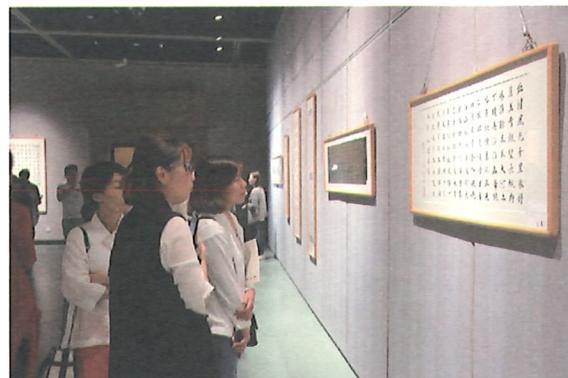
延寿长相思——安康博物馆馆藏秦汉瓦当展
陕西省安康市文物文化广电局、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主办
安康博物馆、武进博物馆承办

春来草自生

——中国书法家武进创作培训基地师生作品展

5月26日—6月2日，由常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常州市武进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武进博物馆、常州大长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春来草自生——中国书法家武进创作培训基地师生作品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基地师生作品70余幅。

中国书法家武进创作培训基地成立四年以来，始终致力于普及书法教育，传承书法文化。本次展览是将师生的优秀作品对外进行的一次阶段性汇报展，也是基地为广大艺术爱好者搭建的学习交流平台。中国书法家武进创作培训基地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能进一步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促进武进、常州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书画发展，推动地区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积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TIME

5月26日—6月2日

春来草自生——中国书法家武进创作培训基地师生作品展
常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
常州市武进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武进博物馆、常州大长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先驱文治

——民国政要海南石刻遗墨展

6月9日—7月25日，由海口市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先驱文治——民国政要海南石刻遗墨展”在我馆举办，展出辛亥革命时期历史名人题字石刻拓片67幅。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英豪们在聚会演说、舞刀弄枪的同时，也时常挥毫泼墨、抒发情怀，展现出特殊时代的翰墨风采。本次专题展作品大部分出自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包括孙中山、于右任、李宗仁、冯玉祥、康有为等，内容为辛亥革命前后的题词、联语，体现了革命者的时代灵魂和人文精神。通过这些展品，观众可窥见革命先驱者的文章功业、襟抱气概和葆有刚健的笃实之美。



TIME

6月9日—7月25日

先驱文治——民国政要海南石刻遗墨展
海口市博物馆、武进区博物馆共同举办

2018年1—6月武博纪事

2017年11月10日—2018年1月28日，南京江宁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共同举办“金玉满堂——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玉器展”，共展出南京江宁博物馆馆藏精品文物85件(套)。

2018年元旦，我馆在少儿社教体验区开展“博物馆里的幸福树”创意木工活动，1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

1月4日，我馆召开博物馆全体维保单位2017年度总结会议。

1月6日，“2017年度武进博物馆志愿者总结表彰大会”在学术报告厅举行，共40位志愿者及家长参加。馆长施建刚、副馆长张宇、讲解接待部主任王颖等出席。

1月11日，“非遗大师工作室”正式挂牌于常州幼儿师范学校，校长杨丽萍与武进博物馆副馆长张宇为留青竹刻大师徐枫老师、面塑大师吕信芝老师、虎头鞋大师虞秀琴老师颁发“客座导师”聘书。

1月24日—3月20日，“文房玉·闺阁金——明清江南地区时尚生活展”在贵州省遵义市博物馆举办。

1月31日，我馆召开2017年度保安队伍工作总结会议。

2月2日，我馆召开武进区博物馆2017年度工作总结、民主测评会议。

2月3日—3月5日，由常州市文广新局、常州市文联、武进区文广新局、武进区美术家协会主办，武进博物馆、常州龙董影视策划有限公司承办，江苏华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常州英诺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常州业勤纺织有限公司协办的“至美疆风——杨凡工笔画贺春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杨凡工笔画五十余幅。

2月16日—3月25日，由镇江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古韵茶香——镇江博物馆藏历代茶具精品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镇江博物馆藏历代茶具精品85件(套)。

春节期间，我馆开展“新春相聚博物馆·幸福树下欢乐多”教育活动，共计发放装有春节小知识、文物小故事、2018年活动免费体验券的新年红包1200个，近3000人参与。

2月16日，我馆开展“吉祥‘汪’的博物馆之旅”社教活动，18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

3月2日，我馆开展“博物馆里过元宵·巧手制作兔子灯”元宵节教育活动，来自湖塘桥实验小学和常州幼儿师范学校的20位学生参与活动。

3月18日，我馆开展“我是小小茶艺师”社教活动，15组亲子家庭参与。

3月20日，“常幼牵手武博·非遗走进校园”虎头鞋项目开课，非遗传承人虞秀琴现场授课，30位学生参与。

3月22日，我馆参加武进区图书馆举行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十九大报告学习讲座，区委党校高级讲师蒋清松主讲。

3月29日，湖北荆州文保中心书记吴顺清、副主任张杨、南京博物院文保所所长张金萍来馆考察，指导我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春秋淹城独木舟修复保护项目。

3月，我馆联合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启动制订《武进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

同月，我馆向上级主管部门专题汇报博物馆南北阙楼瓦片脱落、平台屋檐挑梁断裂、名人馆漏水、漏电及消防不达标等情况。

3月，武进区开展第三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活动，我馆14名同志参与，并与区文广新局共同组成19人的“文化力量”参赛小队。

4月1日，我馆开展“拥抱新时代·放飞中国梦”武博清明节活动，18名未成年人参与活动。

4月3日，区安监局来馆开展安全季度检查。

4月3日—5月22日，由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八百年不熄的神灯——祭祀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化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鄂尔多斯蒙古族历史文物197件。

4月15日，山东省文保中心、湖北荆州文保中心来馆对春秋淹城独木舟取样、测绘。

4月16日，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师生交流团一行20人参观我馆。

4月17日，我馆参加区文广新系统安全生产专职人员业务培训班，武进区安监局时雪晴科长授课。

4月19日，施建刚馆长赴常州参加2018年全省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非国有博物馆工作会议。

4月21日，周璞赴常州博物馆参加江南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

4月21日、29日，我馆开展两场“走进文人书房·体验古书装订”教育活动，共30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

4月27日，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周晓东一行来馆开展安全检查。

4月“读书月”期间，每周六、周日对外开放“小博士图书角”。

5月初，根据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单[2018]第39号文件），武进名人馆闭馆。我馆完成了名人馆展品（书画复制品、书籍、展品）的点交，多媒体设备、部分照明设施的拆除、封存工作。

5月初，我馆收到区人民政府关于博物馆阙楼及屋面安全隐患整改维修的正式批复（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单[2018]第38号文件）。根据方案，修复项目将于7月中旬正式动工，预计2个月时间完成。

5月15日、5月18日，我馆先后在富克斯流行广场、新天地公园开展“行走的博物馆——武进博物馆文化行”活动，展示包括文博法律法规、馆藏精品文物、武进历史名人等移动展板30块。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我馆联合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全国少先队储宁玲名师工作室、卢家巷实验学校、洛阳中心小学，举办“我们爱武博——博物馆教育读本《蒲公英丛书·龙城风情》新书首发”仪式。武进区宣传部副部长、武进区文明办主任戚清萍、武进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周晓东、武进区地方文献研究会会长张尚金、全国少先队储宁玲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储宁玲、卢家巷实验学校副校长张叶英、洛阳中心小学副校长戴虹等出席仪式。

5月21日，由副馆长张宇带队的一行6人赴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参加首届“长三角博物馆教育博览会”。

5月26日—7月31日，由陕西省安康市文物文化广电局、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主办，安康博物馆、武进博物馆承办的“延寿长相思——安康博物馆馆藏秦汉瓦当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秦汉时期精品瓦当80方。

5月26日—6月2日，由常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常州市武进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武进博物馆、常州大长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春来草自生——中国书法家武进创作培训基地师生作品展”在我馆举办，共展出基地师生作品70余幅。

5月26日，我馆开展“笔尖上的瓦当”社教体验活动。

5月，完成胥城遗址考古勘探工作，定位胥城外城河和周边遗迹范围。完成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横林余巷村工地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宋代墓葬三座，出土钱币、釉陶罐等遗物。

5月，《武进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通过国家文物局最终审核，并获得中央财政下拨预防性保护补助经费。

6月4日—6月12日，我馆在武进区行政中心继续开展“行走的博物馆——武进博物馆文化行”活动。

6月9日—7月25日，由海口市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先驱文治——民国政要海南石刻遗墨展”在我馆举办，展出辛亥革命时期历史名人题字石刻拓片67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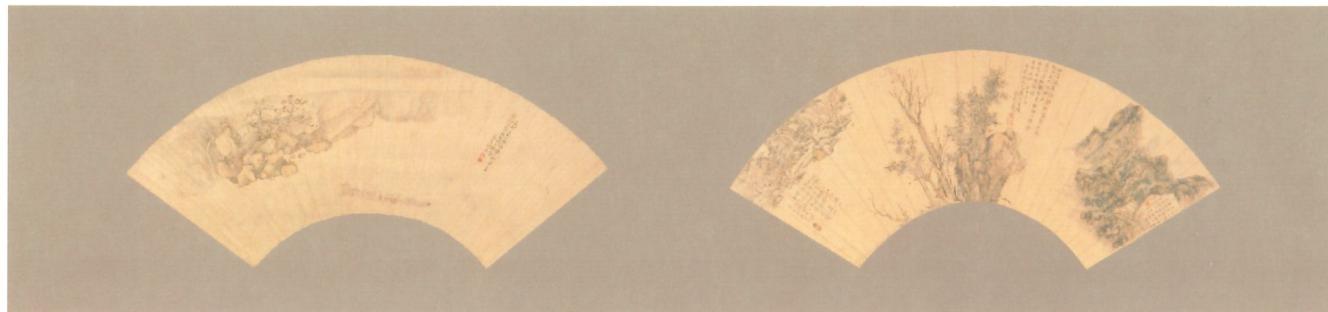
6月16日，端午节假期我馆开展“龙舟竞渡·百舸争流”武博端午节活动，20组亲子家庭参与。

6月20日，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在区图书馆三楼报告厅举办的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讲座。

6月24日—8月6日，由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武进博物馆、常州玉润堂主办，常州市武进区龙承博物馆协办的“文房玉·闺阁金——明清江南地区时尚生活展”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展出。

6月29日，我馆党支部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专题组织生活会。支部书记施建刚代表党支部班子汇报群众意见和查摆问题情况汇总，并提出整改措施。全体党员围绕“四个意识”牢不牢、思想解放够不够、担当作为强不强、作用发挥好不好、自我要求严不严等五个方面逐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清宫折扇与扇面



徐扬仿唐寅设色山水图扇面

盛惇崇、程也园、钱楷合绘设色山水竹石图扇面



允禧设色山水图扇面

董诰设色花鸟图扇面

王原祁仿大痴设色山水图扇面



弘旿设色花卉图扇面

蒋廷锡花鸟图折扇

关槐青绿山水图折扇



玄烨御笔行书诗扇

金笺乌木股弘历临帖诗扇

汪由敦隶书诗折扇



馆藏 沈柔坚荷花图